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准印证号: (甘) LK000046

教学参考

JIAO XUE CAN KAO

-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 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 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律”探微
-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核心要义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主办

1
2023

教学参考

2023年第1期

(总第699期)

2023年2月25日编印

主 编 杨 忠

副 主 编 鲜 鹏

高继明

责任编辑 张雅丽

发送范围

党校(行政学院)系统

Contents

目 录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

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朱佳木(5)

◎哲学研究

灾难的社会性成因及其影响
——基于唯物史观的考察 蒋红群(7)

◎党建研究

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律”探微 楚向红(15)

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王公龙(21)

◎政治学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核心要义 张文显(23)

论集中力量办大事显著优势的形成机制
——基于“组织领导—吸纳整合—监督保障”的分析框架
宋雄伟等(26)

◎经济论坛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徐康宁(34)

◎“三农”问题

农业公司化是农业现代化必由之路 李 静等(37)

◎理论探讨

“胡焕庸线”
——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 秦大河(47)

◎他山之石

普惠金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与行动路径
——基于日本经验的启示 程惠霞等(51)

◎刊中报

坚持底线思维等 8 则 (28)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

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命题，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亮点。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新鲜经验作出科学概括，为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指明前进方向。认真学习领会这个重大命题，对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和蕴含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高屋建瓴、思想深邃的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科学理论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指导意义，同时也深刻揭示了科学理论引领事业发展的逻辑必然和历史必然。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近代以来，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深重劫难，正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成功引领了救亡运动，指导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给在黑暗中奋斗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进而深刻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铁一般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

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中国化时代化才能落地生根、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对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我们党在早年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后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要“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一路走来，我们党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可以说，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找到革命、建设、改革的正确道路，完成近代以来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侧重解决的是“服中国水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侧重解决的是“应时代所需”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二者归根到底是统一的,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真正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必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面对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在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讲新的飞跃,新就新在这一思想科学回答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时代课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进入新时代,面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应时代之变迁、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具有开拓性意义的

理论创造。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内容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形成了一个系统全面、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内在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智慧结晶。

讲新的飞跃,新就新在这一思想形成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原创性理论观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坚持老祖宗,又讲了许多新话,以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创新发展。提出坚持人民至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提出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等等。这些结合新的时代和实践作出的新的理论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认识。

讲新的飞跃,新就新在这一思想引领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新的伟大变革。理论飞跃的衡量标准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实践问题,理论飞跃说到底体现在实践的 伟大飞跃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的变革是划时代的、影响的人群是数十亿量级的、蕴含的价值是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这一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指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人民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

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新时代 10 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同耸立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征途,指引“中国号”巨轮不断驶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这一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定性贡献。核心就是力量,思想就是旗帜。“两个确立”作为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已经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共识和共同意志,已经写在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坎上,是党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三、“两个结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内涵和实现途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深刻指明了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揭示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的奥妙所在。

马克思主义只有为人们所普遍认同,才能成为真诚持久的信仰;只有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的具体实际、历史文化结合起来。100 多年来,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了源远流长的

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两个结合”的高度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高度重视“两个结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强烈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必将使我们党的理论与中华民族 5000 多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史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获得无比充沛的思想文化资源,也必将使我们党的理论更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土地上,扎根于亿万人民的心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推进“两个结合”中形成的,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无论是在中央重要会议上阐述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还是在调研考察中同基层干部群众倾心交谈,或者是在国际重要场合公开阐明中国的原则立场,总书记始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要思想源泉,旁征博引传统文化经典和历史典故,承继中华文明人文精神、道德价值、历史智慧的精华养分,开辟了 in 深厚传统中取精用宏、固本开新的治国理政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以其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召力,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坚持“两个结合”,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全面系统的掌握,需要对本国国情有深刻准确的把握,需要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怀有足够的礼

敬。要把“两个结合”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在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四、在践行“六个必须坚持”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报告从6个方面作了概括和阐述,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是我们党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正确路径,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揭示了这一思想根本的政治立场、彻底的理论品格、独有的精神气质、科学的思想方法,为把握好、运用好这一科学理论的思想精髓、进一步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提供了“金钥匙”,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解决了“桥和船”的问题。

“六个必须坚持”构成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贯穿体现在“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的全部内容之中。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属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本的价值立场;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在的精神特质;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是贯彻党的思想

路线的内在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的理论品格;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风格;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展现了我们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宽广格局,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有的大视野大境界。

“六个必须坚持”既是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点,也是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点。把握运用好“六个必须坚持”,就能更好地领会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更好地将其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修养、理论素养、道德修养和履职尽责的本领。做到了“六个必须坚持”,对真理的认知就会更加深入,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就会更加显著,就能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奋进新征程,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更加紧迫、更为繁重。要增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深刻领会“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摘自《求是》2022年11月20日
张雅丽/摘编校)

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朱佳木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前进道路上,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些重要论述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现代化。

“现代化”一词最早产生于18世纪的欧洲,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明等各方面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当时,这种转变只能通过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直到20世纪初发生的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这时,现代化才有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另一种选择,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提出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任务之一仍然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过,在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周恩来同志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目标。1964年,周恩来同志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性任务,指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5年,周恩来同志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了“四化”目标和两步走设想。以上说明,我们党自新中国成立后,就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现代化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在新长征过程中,面对一些错误思潮,邓小平同志掷地有声地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于为什么必须坚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他作出了两点解释。第一,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

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第二,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提出分两步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他旗帜鲜明地批判那种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的错误观点,指出:“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

正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它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具有基于我国国情、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什么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概括,即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并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针对资本主义现代

化的这些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加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要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国经过70多年接续不断的努力,现在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是必须坚持的唯一正确的拥有光明未来的根本制度。只要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世界的现代化版图必将彻底改写,我国对人类历史必将再次作出意义重大而深远的贡献。

(摘自《经济日报》2022年11月30日)

张雅丽/摘编校)

作者简介: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灾难的社会性成因及其影响

——基于唯物史观的考察

蒋红群

一、何谓灾难：唯物史观“关系”视域下的考量

“灾难”作为一个宽泛概念，通常被社会科学“用来指代事件/过程”。基于事件/过程的角度，可将“灾难”定义为某一具有潜在破坏力的事件或诱因与某一社会特定区域及特定人口相结合并导致社会损害的过程。人类面临的灾难复杂多样，可依据不同标准作不同的类型界分。根据灾难的表现形式和致灾因子的不同，灾难可划分为自然灾害和社会灾难。前者主要指在自然界中产生并危及人类生命财产安全的地震、洪水、干旱、飓风、海啸、蝗灾、瘟疫、气候变暖等自然灾害事件；后者主要指在社会领域中产生的战争、饥荒、殖民、侵略、经济危机、政治动荡、难民潮、工业事故、空难、核泄漏、恐怖袭击等社会灾难事件。根据灾难的具体样态，灾难涵括瘟疫灾难、经济灾难、政治灾难、阶级灾难、战争灾难、技术灾难、生态灾难等。根据灾难的严重程度不同，灾难可划分为一般灾难、重大灾难和毁灭性灾难。

从唯物史观的“关系”视域考察灾难，有三点特别值得加以论说。

第一，要从人与自然关系维度把握自然灾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马克思在此并非否定自然界的自在性，而是强调不能撇开人类主体和人类实践方面去抽象地谈论

与人分离的自然界。推而言之，无论何种自然灾害，本质上都是关乎人类自身的属人灾难。有自然变异未必成灾，成灾的条件是自然变异作用于人类并给人类造成了严重伤亡和财产损失。灾难的属人性意味着，若没有人类主体或者在人类活动范围之外，便无所谓自然灾害；反之，只要人类主体在大地上从事活动尤其是从事直接的生产活动，就有被卷入自然性灾难场景的风险。历史地看，每当人类的农业生产、工业活动超出自然界负荷而变成对自然界的过度索取，甚至引起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而这样的“报复”多半会以始料不及的自然灾难收场。正如灾害史学者夏明方所论，人类活动加诸自然界的强烈影响带来了一种悖论性结果，即人从自然灾害的“承灾体”变成了自然灾害的“成灾体”，从环境恶化的“受害者”反转成了环境恶化的“施害者”。概言之，自然灾害是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复杂互动、交相施为的灾变性产物，它兼具自然性和社会性，即使是纯粹由“天灾”引发的自然灾害，就其客体主体化的后果和人类的在场性、亲历性而言，也彰显了特定的社会属性。

第二，要从社会关系维度把握社会灾难。研究自然灾害须追溯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社会灾难则要回到社会关系层面。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社会灾难（如战争、殖民、征服、经济大萧条等）都

与一定的社会关系密不可分。这既是说社会灾难必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空间”中展开,更是说社会灾难的实质就是社会关系问题,即社会关系的内部矛盾激化到相当程度而最终冲破社会安全阀的结果。就此而言,社会灾难是社会关系的测量器,它能将社会历史时空中某一层面、某一时段的社会关系问题反映和暴露出来。只要某种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一直存在,相应的社会灾难就会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而某种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的改变和终结,往往预示着相应的社会灾难的改变和终结。甚至有时候腐朽落后的社会关系便由灾难敲响丧钟,而新的社会关系则在灾难时期过后诞生。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关系作为一个抽象的总体性概念,连接着社会经济关系、社会阶级关系、社会政治关系、社会文化关系等具体丰富的关系领域。毫无疑问,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社会制造了大量残酷无情的阶级灾难。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重社会灾难中的阶级灾难,恩格斯甚至断言:“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阶级灾难放在资本主义诸灾难研究的核心位置,对之进行了大量令人难忘的细节描述和道德评判。再者,阶级灾难以外的许多社会灾难,也或隐或显地与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交织在一起。

第三,要从普遍交往关系维度把握全球灾难。交往作为横向意义上的社会关系,是灾难产生的媒介和前提。历史表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在生产力发展进步下不断扩大和加深,由此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又使得各民族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日益频繁和复杂。一般而言,人类交往越具广度和深度,灾难后果的影响和波及范围就越大。在前现代社会,一个极致表现是亚欧诸文明之间曾不间断地因为某一新兴帝国横跨大陆的征战、扩张和疫病的远

程传播,而给受害地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和灾难。但这样的灾难因交往范围有限而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灾难。真正的全球灾难,即那种会波及到全球绝大多数地区和绝大多数人口的灾难状态,只有当全球尺度的普遍交往形成之后才会产生。与此相关的历史转折点是新航路的开辟和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来临。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藉由新航路开辟发现了新大陆,并很不幸地给美洲和非洲人民带来了巨大浩劫。其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贸易扩张愈益将地球上的人类真正连接为一个整体,灾难也就日益具有了超出国家边界的世界性质。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编织世界交往网的同时也在编织世界灾难网,在召唤全球化的同时也在召唤与资本主义本土灾难交织在一起的全球性灾难。这提示着世界在发展之中也在灾难之中相互关联,提示着人类普遍交往关系的脆弱性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紧迫性。

综上,唯物史观“关系”视域下的灾难作为消极性、破坏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具有特定的关系意涵。灾难是在一定的关系向度中生成和衍化的,关系勾连着人和灾难,具体的关系性存在始终作为前提置身于灾难面前。灾难往往根植在复数性、互嵌性和风险性的多重关系图景之中。譬如,战祸、劫掠、饥荒、动荡等社会灾难不仅归因于社会关系乃至普遍交往关系的严重冲突,也时常与旱灾、蝗灾、气候变化、土地贫瘠、资源匮乏等自然性致灾因素关联在一起。再如,新冠肺炎疫情、极端气候等自然灾害既关涉矛盾突出、裂痕扩大的人与自然关系,又与陷入冲突和危机中的社会关系、普遍交往关系息息相关。

二、灾难的四重社会性成因:立足唯物史观的多维度阐释

灾难何以发生?又是什么原因促使灾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长期存在?这是所有灾难学研究都致力于解答的基本问题。大体说来,

自然科学关注灾难的自然性成因,社会科学相对更重视灾难的社会性成因,原因在于自然灾害终究是属人的、社会性的事件,它背后牵涉着更深更大的社会问题,对其成因进行社会层面的分析是不可或缺的。社会科学最初运用“致灾因子-灾难事件”模型来解释灾难成因,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更为主流的“脆弱性”视角,认为灾难是自然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相结合而引起的破坏性后果。“脆弱性”概念较为宽泛和模糊,纯粹的“脆弱性”分析范式既难以充分阐明是哪些要素导致了人类社会自身的脆弱性,又因缺乏开阔的历史眼光和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很难恰当解释人类历史上何以会发生黑奴贸易、帝国主义殖民战争、纳粹大屠杀等深重灾难。在笔者看来,唯物史观的观点、方法对于灾难的社会性成因研究更具普遍意义上的阐释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曾引人深思地指出,德国“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马克思在这段论述中不仅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划界,明确界分了前资本主义性质的“传统灾难”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灾难”,而且澄明了灾难“社会因”的关键之点。一是从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运动中探寻灾难生成的社会-历史之源;二是强调“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与灾难之间也有着某种联系。这就启示我们,需要将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要素广泛地纳入灾难成因的社会性解释框架之中。前文已从“社会关系”的宏观角度阐述了灾难的内涵与实质,下面将基于经济性维度、政治性维度、观念性维度、资本性维度更具体地探讨灾难的社会性成因。

从经济性维度看,灾难的社会性生成同落

后的生产力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深度联系在一起。就灾难与落后生产力的关联而言,一般说来,社会生产力越是落后的时代,往往越是灾难丛生的时代,这其中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机制。其一,生产力落后和停滞的社会更易遭受普遍性匮乏和贫困的灾难,“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二,生产力落后和停滞的社会更难抵挡重大自然灾害的侵袭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粮食危机和社会动乱。其三,生产力落后和停滞的社会更易激发人类身上的争斗本能,进而有可能导致与资源、产品和生存物资相关联的群体冲突和掠夺性战争。其四,生产力落后和停滞的社会更难避免健康和疾病的威胁,落后的经济状况和医疗卫生水平仍无情地制约着人类的寿命。其五,生产力落后和停滞的社会更易遭受外敌入侵和被列强欺凌与瓜分的社会性灾难。所谓“落后就要挨打”,很大程度上是对世界历史语境下生产力落后与国家灾难之间显著相关性的一种通俗表达。就灾难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关联而言,灾难的社会性生成同私有制性质的生产关系有着古老、深刻而又复杂的内在勾连。唯物史观令人信服地证明,从古代奴隶制到中世纪农奴制,再到近代雇佣劳动制,每一种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诞生都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具有剥削和统治功能的榨取型生产关系的出现,被剥削阶级的许多社会苦难即源于此。为了阐明这一点,不妨结合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个真实案例来展开讨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资本积累过程时曾提到近代灾荒史上很有名的爱尔兰大饥荒。“爱尔兰1846年的饥荒毁灭的人超过100万,然而全是穷人。”马克思所关切的问题是,为什么饥荒中毁灭的全是穷人,其社会原因又是什么。生产资料私有制才是饥荒灾难发生或加重的生产关系根源,穷人缺乏食物所有权或者索取食物“权利失败”其实是从私有制中派生出来的次

要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将饥荒灾难还原成私有制弊端的唯物史观解释,对于阶级社会中其他社会灾难的成因分析也是普遍适用的。

从政治性维度看,灾难的社会性生成与社会制度的缺陷以及统治阶级的劣政紧密相连。马克思恩格斯尤为注重从制度层面研究灾难的社会性成因,在他们的审视中,社会制度缺陷是引致灾难或加重灾难的关键因素之一。就宏观层面而言,这里的社会制度主要指以私有制为根基的涵括了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私有型社会制度。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诸种灾难之间的因果关系。恩格斯在谈及工人阶级灾难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时曾指出,造成工人贫困和商业危机的“灾难性的波动的因素”在于“已经不适当当前情况的社会制度”。因此,“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缺陷及其灾难性后果也有精辟论述,他在晚年回应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问题时强调:“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就中观层面而言,灾难与一个国家处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具体制度的缺陷和失能有所关联。譬如,同样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什么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等经济灾难更频繁地发端于欧美发达国家而非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其中的原因或许只有结合欧美国家过度膨胀的金融制度、福利制度等才能解释清楚。再如,同样面临新冠肺炎疫情,为什么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高于中国的西方国家,其感染人数、死亡人数却远远超过中国?对此,似乎也只有深入西方国家积弊已久而又难以改革的经济制度、民主制度、政党制度、新闻制度乃至文化制度,才能作出全面而有说服力的阐释。值得一提的是,在唯物史观的政治视域中,灾难的成因研究既需要制

度维度的介入,也离不开对政治主体维度的考量。唯物史观虽然反对唯心史观将历史灾难简单地归咎于统治阶级的劣政而不去进一步追溯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根源,但在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的辩证平衡中,唯物史观也承认并且重视政治主体的历史作用,认为社会灾难的发生往往与剥削阶级和统治者的残暴贪婪、腐败昏庸、野蛮专横、胡作非为等主观因素相伴相随。

从观念性维度看,灾难的社会性生成与意识形态场域中的严重问题有着深层关联。马克思恩格斯既立足唯物史观深刻阐释了意识形态的一般性原理,又从观念批判角度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即意识形态场域中的严重问题蕴含着不可低估的社会危害性。马克思当年之所以毫不妥协地驳斥拉萨尔主义,原因即在于要阻止“‘理论上的’灾难”衍化为实践上的灾难。列宁批判民粹主义、折中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左”倾教条主义等思潮以及毛泽东展开与本本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宗派主义等斗争,其用意也在于此。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问题与社会灾难的深层关联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虚假、错谬、落后、危险、极端的意识形态,是许多历史灾难发生的观念根源。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在捍卫纯正信仰的名义下刑罚和迫害异教徒,到近代西方列强基于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到处进行殖民掠夺;从“二战”期间德国与日本在崇尚暴力政治和仇恨政治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观念加持下将全世界引向毁灭性战争,再到20世纪晚期以来美国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在世界各地不断制造“颜色革命”,虚假、危险的意识形态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灾难印记。第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被放大到极端对抗的地步,是导致冲突型社会灾难的直接诱因。尽管意识形态的不同未必会带来冲突,然而检视人类历史,总有一些政治势力或宗教势力在非黑即白、偏执荒诞的极端

思维下,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夸大化并将之引向族群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宗教之间的暴力对决。这一点在宗教历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众所周知,宗教理念的长期不和,致使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曾经陷入长达上千年之久的漫长对抗,同样的原因也在中东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埋下了历史的积怨和冲突的种子。事实上,即使是同一宗教内部的教派分裂,也足以在无休止的争斗中掀起一系列自相残杀的宗教战争。第三,主导意识形态的解构和崩塌,是政权瓦解、国家坠入灾难深渊的深层次原因。马克思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苏联在西方多年历史虚无主义、自由主义的渗透和攻势下,走向了篡改、消解马克思主义的不归之路,最终因主导意识形态的分崩离析而悲剧性地解体。

从资本性维度看,灾难的社会性生成自近代以来越来越与资本逻辑的负向效应密切相连。第一,资本逻辑致使传统社会中的某些灾难在资本主义历史地理景观下发生了全新形变。如经济灾难古已有之,但资本逻辑引致的经济灾难却以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表现出来;阶级灾难亦古已有之,但资本逻辑作用下的阶级灾难则以资本家占有工人剩余劳动、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总形式表现出来。其他诸如战争、殖民、侵略等社会灾难也是如此,它们在资本逻辑的介入和历史效应下,大都呈现出为资本增殖和资本统治服务的新的现代特质。第二,资本逻辑对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的裹挟和钳制致使现代社会出现了某些传统社会未曾有过的、愈渐深重的新型灾难样态,比较典型的如资本主义性质的机器灾难、技术灾难和生态灾难。第三,在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的扩张致使地球上任何一端发生的重大灾难事件都极可能在“蝴蝶效应”的作用下殃及整个世界,人类被迫面对经济灾难、战争灾

难、生态灾难、技术灾难、瘟疫灾难等日益跨国化和加速化的全球性挑战。显然,资本逻辑直接催生了全球性的“现代灾难”,并形塑了“现代灾难”的形态变迁和未来走向。假如资本难以自制的逐利欲望和破坏意志无法被外力彻底击碎,那么等待人类和地球的终局或将是难以想象的空前灾难。

由上可知,唯物史观主张将灾难的社会性成因放置在长时段的人类发展史中加以考察,以增强灾难成因解释的历史感和宽广度,同时也主张从更具体丰富的维度去透析灾难的社会性生成与持久性存在。申言之,经济性维度是透视灾难发生的根本立足点,但由于人类社会和历史本身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仅靠单一的经济性维度来解释灾难何以产生是远远不够的,政治性、观念性、资本性等维度也是重要的考量因子。就此而言,经济层面的落后生产力与私有制生产关系是灾难发生的社会总根源;政治层面的社会制度缺陷、统治阶级劣政,以及观念层面的意识形态虚假、错谬、冲突与崩溃等,是灾难发生的较为普遍的社会原因;资本层面资本的负向效应则是“现代灾难”生成的至关重要的社会原因。一言以蔽之,灾难是内蕴风险和危机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观念因素乃至资本因素与一定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结合的产物。

三、灾难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内在机理和历史限度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说,灾难是人类社会的固有部分。人类社会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发展故事,它还有无以规避的灾难一面。就自然灾难来说,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不断与随时可能发生的自然灾难进行斗争和较量。时至今日,地震、火山、海啸、旱灾、洪涝等自然灾难引发的人间惨剧依然不断上演。就社会灾难来说,人类社会迄今仍未摆脱形形色色的社会灾难的打击。尽管当代人面临饥荒、战争、劫掠、食物短缺、非正常死亡等风险

的几率比古代人要小得多,至少饥荒、战争不再有从前的那般规模和破坏力,但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全球扩张,一些新型的社会灾难和风险又不断地涌现出来。现代风险和现代灾难都是深嵌于当代社会的常态事件,二者相互缠结、相互转换,反映并深化了现代性的发展悖论和危机。

其次,灾难的影响力波及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在人口领域,灾难是造成人口死亡和人口迁移的一个常见原因。灾难的最大危害莫过于直接夺走人的生命。单是一场传染性强的瘟疫,就可能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绝对人口遭受灾难性的下降。另一方面,许多历史证据表明,重大的灾荒、战乱、瘟疫等灾难有时会导致人口的大规模迁移,甚至出现难民变国际移民的社会景象。在经济领域,灾难是干扰经济运转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外生变量。灾难的破坏性越强、波及范围越广,经济发展面临的震荡和冲击也就越大。在政治领域,灾难是阶级冲突加剧、社会危机放大、社会革命爆发的导火索。在文化领域,灾难是文化变迁、观念转型和信仰改变的诱发因素。譬如,基督教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发生了大瘟疫,瘟疫的扩散传播导致了福音的诞生。而中世纪“黑死病”的百年肆虐又使人们对上帝信仰产生怀疑,最终导致提倡人性启蒙的文艺复兴的出现。在日常生活领域,灾难是人们日常工作方式、学习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得以“突然”改变的强制力量。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人们,无疑能够深切体验和强烈感受到这一点。

再次,灾难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因素。对此,可从以下几种情形来考量。第一种情形是,某些重大灾难构成了一个城邦或国家的历史命运的转折点。譬如公元前5世纪,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雅典瘟疫,使雅典军事力量遭受重创,最终雅典在战争中落败,再也不复往日辉煌。第二种情

形是,某些重大灾难因其世界性、转折性的深远影响,本身就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譬如十字军东征、欧洲黑死病、美洲殖民化、两次世界大战、苏联解体、“9·11”事件等。这些事件要么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要么形塑了现今的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第三种情形是,某些重大灾难关乎地域文明的兴衰终结和世界文明的更替演变。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等远古文明之所以相继衰落、断绝于世,其中有诸多不同的解释,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摧毁性的战争或外族征服,雅利安人入侵古印度致使古印度文明逐步消亡便是一个典型例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陷入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不过,对于某些古代帝国来说,被战争、外族统治摧毁的一切都要从头再来的不仅有生产力,还有文明形态本身。用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的话来说,“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当然,那块失去了原生文明的土地或社会空间,并非从此就不再存有文明,而是通常会有新的文明浸润其中,由此带来一种新型文明的地理蔓延和影响力扩大,直至推展到广阔的域外疆界而成为影响深远的世界性文明。历史上,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便经历了大抵如此的崛起过程。然而,文明的过度侵入和强制同化过程往往也是历史灾难的制造过程,一如资本主义文明在美洲的强势传播最终导致了美洲土著文明的覆灭。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等社会灾难的铺垫,就没有美洲大陆的殖民化、资本主义化以及美国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进言之,资本主义文明转变成世界文明,就其负面效应来说是一个新旧灾难互渗互生从而构成现代型灾难样态的过程,是一个灾难

资本主义化和资本主义灾难化的历史进程。

最后,人类对灾难的反思和应对在某些条件下能够转化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人类社会变迁史是一部发展与灾难相互交织、复杂纠缠的历史。一方面,社会发展过程常常潜藏着灾难和危机,其越是接近工业文明,接近资本主义社会,情况越是如此。另一方面,灾难对于任何个体和社会来说都是莫大的不幸,不过,有些灾难和危机客观上也蕴含着社会发展的机遇。必须申明的是,这里并非说灾难本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是说人类应对灾难的内在需要、理性反思和实践行为,会“倒逼”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诚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人类文明自始至终就是在灾难冲击与社会应对的历史过程中创生、延续和发展的。需要强调的是,除了人类善于在灾难应对和反思中驱动社会发展这种情况之外,灾难在铁的社会发展规律作用下还是历史进步的特殊工具。这一观念源自马克思,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论证指出,英国殖民者给印度带来了从根底处破坏印度传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灾难。就人的情感而言,看到印度古老的社会组织和制度文明被土崩瓦解、投入苦海是会感到难过的,但从历史衍化的观点来看,英国在印度动摇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留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明基因,这对于印度乃至亚洲来说不啻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

以上讨论表明,灾难作为一种历史塑造力,对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具有一种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将灾难的社会-历史效应凸显出来是一回事,如何“安置”灾难在人类社会变迁中的历史作用又是另一回事。问题恰恰在于,一些学者在凸显传统历史学有所忽视的灾难维度时,有意无意地夸大了灾难尤其是瘟疫灾难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作用。在笔者看来,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和戴

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就存在此类思想倾向。耐人寻味的是,这两部原本就颇有名气、因疫情再度走热的著作,都提到了史上一桩不可思议的灾难性事件,即16世纪西班牙人入侵美洲时所携带的诸多传染病病毒,给美洲印第安人带去了万劫不复的人口灾难。麦克尼尔指出,西班牙人登陆新大陆带去的天花病毒不可思议地摧毁了当时人口原本稠密的印加帝国,以至西班牙竟然能以区区几百人的力量轻易征服并成功控制了广袤的美洲土地。相形之下,“无论征服者的暴力和漠视如何残忍,都不是导致美洲印第安人急剧减少的根本因素”。戴蒙德同样强调人类历史上致命病菌的危害性,在他看来,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病菌的,要比在战场上死于欧洲人的枪炮和刀剑下的多得多。换言之,如果没有隐藏在枪炮和钢铁之下的凶恶病菌,美洲的人口覆灭和被征服或许并不会在那么少的欧洲移民侵略下发生。用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的总结性评论来说,“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麦克尼尔的判断有启人深思和价值合理之处,因为瘟疫的确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从短时段来看,有时一场灾难性的瘟疫在单一的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为直接和关键;从长时段来看,人类与瘟疫长期为伴、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的交互性关系一直延续至今。但由此把瘟疫的作用抬高到影响人类历史的“决定因素之一”的程度,恐怕是对人类历史片面、过度的解读。且不说历史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背后并无明显的瘟疫因素参与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包括瘟疫灾难的任何灾难都根本无法上升为历史衍化的终极解释,“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麦克尼尔、戴蒙德将欧洲人征服新大陆的主因归咎于瘟

疫传播,却掠过了那场瘟疫背后更具历史支配作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力量。其实,即使没有瘟疫传播这样的历史细节,旧大陆和新大陆各自的生产方式、经济社会结构以及它们在资本崛起时代必然发生的历史冲突,也迟早会导致欧洲人占领新大陆以及资本主义的向外扩张。进而言之,倘若我们的学术目光仅仅定睛在某些灾难性事件身上,不免会误入“强制阐释”,在逼近历史客观性的同时又扭曲了历史客观性。只有从“物质生产方式是历史前进的最终动力”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基于多维性、复杂性的社会关系去透析灾难的成因与影响,才不至在灾难性事件的重重迷雾中迷失方向,得出以偏概全、似是而非的历史结论。

如此看来,灾难诚然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又是触发人类社会变迁的深层动力,有的重大灾难性事件甚至会出乎意料地开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或一种文明的终结之门,但从唯物史观的整体视野看,灾难的社会影响即使再深再广,也根本无法改变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现实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无法影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之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决定性作用,无法阻挡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衍化的一般历史趋势,无法消除人类文明从低级往高级螺旋式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概而言之,我们不能孤立地、单一地看待灾难之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发挥。灾难无法在人类历史整体性和人类社会总规律之外,“制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历史运动规律。

结 语

依循上文分析和论证,可得出如下研究结论:其一,“关系”向度的引入有助于理解灾难的核心意涵。社会科学将灾难视为破坏性的事件/过程固然深刻,但也要看到,任何灾难都连接着具体历史环境下的关系世界,即使是灾难性的事件和过程本身,也是内在于一定关系

场域中的关系性事件、关系性过程。灾难根本无法与一定的具体的关系割裂开来,关系性是灾难的显著特征。其二,灾难的社会性成因需要从多个维度、多个层次加以综合性论析。经济性维度、政治性维度、观念性维度对于探究灾难的“社会因”具有普遍性意义,而要深入考察当今世界“现代灾难”的由来,则需将资本性维度置于分析框架之中。实际上,资本逻辑本身即蕴含着一种自我失控同时也可带动社会失控的深度灾难化潜势,能否驾驭资本逻辑,从根本上关乎“现代灾难”的治理应对和现代性的全新建构。其三,应辩证地考量灾难之于人类社会的影响。人类所处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灾难的世界,无论如何都不应忽略或低估一直以来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灾难力量。灾难在学术层面亦不可缺席,比如灾难与社会发展、社会革命、人类文明、宗教、资本主义、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联就很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究。不过,相对于生产方式、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来说,灾难终究只是历史合力中次要的、非主导性的力量,其历史作用有内在的限度和边界。因此,我们既要充分考量又不能片面强调乃至夸大灾难之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力,避免陷入人类灾难决定论、疫病决定论那样的历史阐释观。

总之,灾难是一个诸多学科都在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将之上升到历史哲学、社会哲学高度并放置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加以解析,有助于对历史和现实中的灾难作出更为全面和科学的理论阐释,也有助于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灾难学研究中的话语地位和独特价值。

(摘自《哲学动态》2022年第7期)

张雅丽/摘编校)

作者简介:蒋红群,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探微

楚向红

1945年7月,党的七大结束后不久,国民参政员黄炎培先生应邀到延安考察访问,他向毛泽东提出了如何跳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的答案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时隔76年之后,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又专门提到了“窑洞对”,并明确提出“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一、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必须“严”字当头

习近平关于“自我革命”的论述内涵极其丰富,其中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严”。“严”是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最鲜明的特征。“严”的标准是刀刃向内从严治党,具体要求是严修身、严用权、严律己。

严修身是坚持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最基本的遵循。习近平指出：“为政之道，修身为本。”严修身必需在修心、立德和立志三个方面下功夫。首先，要修心。修对党忠诚之心，真正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修服从之心，真正做到服从领导、服从组织、服从纪律、服从组织程序；修敬畏之心，真正做到敬畏法律，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修勤勉之心，真正做到爱岗敬业、艰苦奋斗、责任担当；修为民之心，真正做到坚持人民至上，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

民就是江山”，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其次，要立德。习近平指出：“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党员干部要做一个有德之人，不断提高道德修养，坚守做人、做官、做事的道德底线，筑牢道德和法纪两道防线。再次，要立志。一方面要立理想信念的志向。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实践证明，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是从理想信念丧失或者动摇开始。共产党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首要任务，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另一方面要树立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这“三力”是习近平对青年干部的殷切希望，也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普遍要求。立意志力，就是要立“望尽天涯路”志存高远的志向，立“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难又出发”的顽强意志。有了坚强勇敢、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就有了“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的坚毅，“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无畏。立坚忍力，就是要立坚毅的政治定力和超强的忍耐力得之不喜，失之不愠，去留无意，宠辱不惊。立自制力，就是要立坚毅的控制力，这是为政修身的基础性、保障性能力，核心是自省自律的能力。

严用权是严修身的重要内容，是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关键所在。习近平在论述权力观时明确指出：“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这既说明了

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又说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首先,要毫不动摇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这是掌好权用好权的本质要求。党员干部无论官有多大、权有多重,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必须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行使权力的最高标准,决不能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其次,掌权用权要出于公心。习近平要求党员干部:“我们共产党人掌权用权,最重要的是要出于公心,做到公正处事、公道用人,坚持‘五湖四海’,不搞亲亲疏疏,不拉帮结派,严格按照党的用人标准和政策办事。”再次,行使权力与责任担当紧密结合。习近平多次强调:“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这是权力运行的规律,更是权力运行的必然要求。权力就是岗位,岗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党员干部要严格遵循习近平的要求:“在难题面前敢于开拓,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在风险面前敢担责任,尽心尽力干好工作”,珍惜使命,不负重托,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最后,严用权必须严监督。权力本身具有二重性,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发生异化、导致腐败。严监督也是党坚持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然遵循。这就要求党员干部要“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时刻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严律己就是严做人,老实做人、做老实人,这是严修心、严用权的关键。习近平指出:“老实做人、做老实人,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内在要求,是领导干部‘官德’的外在表现。”首先,要老实做人。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做老实人,落实“四个真正做到”:真正做到信念坚定、为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真正做到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真正做到坚持事业为上、

公道正派,不唯票、不唯分、不唯生产总值、不唯年龄;真正做到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珍惜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时刻想着为党解忧、为国奉献、为民造福。其次,要干净做事。共产党人干干净净做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宗旨的内在要求,是老实做人的根本,也是做老实人的基本途径。干净做事,是衡量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是否做老实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党员干部真正做到干净做事,就要加强党性修养、提升思想境界,确保干净做事的自律能力;就要强化自省意识,提高干净做事的自我约束能力;就要强化敬畏意识,坚持干净做事的基本原则;就要强化法治意识,筑牢干净做事的法律依据;就要强化民主意识,运用好干净做事的科学方法。

坚持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除了从严治党外,还要坚持从硬管党,这是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打铁必须自身硬”,首先,严明铁的纪律。纪律建设是党坚持自身革命的治本之策。习近平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没有全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减弱甚至消失。严明铁的纪律,一方面执纪要硬,要用铁的纪律来约束党员干部,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其次,坚持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对那些腐败分子,不管官有多大,位有多高,该抓的抓,该杀的杀,毫不留情、毫不手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铁面执纪”,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人”的反腐决心和以雷霆之势惩治腐败的强硬手段。

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

在不断自我革命的大熔炉中淬炼而成的。党经历百年而更加充满朝气活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长期的不停步的自我革命,靠的是自我革命精神的有力支撑。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全面从严治党就要跟进到什么阶段,坚持严字当头,把严的要求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做到管党有方、治党有力、建党有效。”

二、在“四个自我”上下功夫,处理好“四个关系”

习近平指出,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要坚持问题导向,真刀真枪解决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是自我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的具体要求。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首要的是坚持问题导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问题是事物内在矛盾运动的外在表现,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有矛盾的地方,也就必然会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调研的基础上,指出党内存在着“七个有之”：“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这“七个有之”,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对党的建设产生了严重影响,成为党坚持自我革命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及时发现问题,更要善于正确分析问题。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党员队伍构成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老问题反弹回潮的因素依然存在,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矛盾的多样性决定了问题的复杂性。复杂多变的问题不会简单直观地

表现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深入的调研分析、科学研判,找出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对策,从而不断提升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是前提,解决问题是目的、是关键。习近平强调,解决自我革命的问题,就是要坚持刀刃向内:“要教育党员干部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广泛听取意见,认真检视反思,把问题找实、把根源挖深,明确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检视问题要防止大而化之、隔靴搔痒,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防止以上级指出的问题代替自身查找的问题、以班子问题代替个人问题、以他人问题代替自身问题、以工作业务问题代替思想政治问题、以旧问题代替新问题。针对查摆出来的问题,要对症下药,切实把问题解决好。”

习近平在论述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时,反复告诫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只有这样,才是过硬的自我革命。要做到过硬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提出了三点基本要求,归纳起来是“两个时刻”“一个永远”:

一是时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习近平指出:“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是坚持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遵循,更是对党的建设规律和国家治理规律的深刻总结。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能力,深入推进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必须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

二是时刻防范糖衣炮弹、永葆政治本色。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凭空而来的,最终要靠每一名党员干部来体现、来落实。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始终以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尤其是今天,国际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四大考

验”“四种危险”的挑战更加严峻,社会环境、利益关系的影响更加深远,各种“糖衣炮弹”的诱惑也更加隐蔽,更需要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认识,强化党性修养,率先垂范,时刻防范“糖衣炮弹”的进攻,永葆一名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

三是永远不能骄傲自满、始终艰苦奋斗。回顾走过的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党和人民的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但是,我们决不能丢掉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尤其是在新征程中,我们还面临着很多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更需要党戒骄戒躁、始终保持坚持艰苦奋斗的品格,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夺取新的胜利、创造新的辉煌。

2019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对党的自我革命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四个自我”既有破又有立,既有施药动刀的治病方法又有固本培元的强身之举。“四个自我”是坚持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路径。习近平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在“四个自我”上下功夫:

其一,在“自我净化”上下功夫。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本质区别,就是在自我净化与自我革命中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自我净化的关键,是通过过滤杂质、消除毒素、割除毒瘤,不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党员干部要将“自我净化”作为终身课题,积极主动地对照党章党规查摆问题,弥补自身的短板,克服自身的缺点,在自我修正中不断提升,在自我净化中不断完善,为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其二,在“自我完善”上下功夫。要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固根本、防源头、治苗头、打露头,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督机制,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党员干部要自觉加强政治修养、党性修养、理论修养,以大视野、大情怀、大担当的高标准坚持不懈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和

工作能力,在不断追求真理、加强实践的过程中磨炼自己、完善自己、提升自己,自觉担负起新时代的职责和使命。

其三,在“自我革新”上下功夫。主要是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通过革故鼎新不断开辟未来。党员干部坚持革弊鼎新求突破,既要有敢于正视自我的勇气,又要有敢于“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病症、解决自身问题的决心,承受得住“壮士断腕”的自我革命之痛感;要勇立改革发展的时代潮头,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势所向,不断开拓进取,追求创新发展;要争当先锋创新业,敢于回答新问题、解决新矛盾、开拓新境界。

其四,在“自我提高”上下功夫。党员干部要有学习的紧迫感,思想上重视学习,行动上善于学习,自觉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学出绝对忠诚、学出坚定自信、学出使命担当,增强政治历练、党性锻炼和实践锻炼,努力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能,科学判断发展形势,准确把握时代前进脉搏,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理想信念、推进自我革命、推动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

坚持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必须处理好“四个关系”,这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方法论:

第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的党。在新征程中,要继续获得发展、赢得胜利,就要始终发扬斗争精神,不断提高斗争能力,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和决心,同一切弱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动摇党的执政根基、违反党的纪律和规矩的一切行为作坚决彻底的斗争,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动摇,始终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向心力和凝聚力。

第二,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只有勇于推进自我革命,才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国家才能更加兴旺发达,人民生活才能更加幸福美好,民族复兴才能有坚强保证。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才有底气和决心敢于直面问题、勤于自我革命,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这就要求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宗旨,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同时要以新的理念、思路、办法、手段解决好各种矛盾和问题,在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中不断提高自我革命实效。

第三,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从严管理出战斗力,真诚关爱出凝聚力。严管在本质上就是关爱,厚爱必须首先从严。推进自我革命,严管和厚爱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健全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捆住一些人乱作为的手脚,放开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手脚,不断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建功新时代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党的建设全面提升和进步。

第四,坚持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是推进自我革命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自我革命既要靠组织严管、严教、严监督,又要靠党员干部自觉行动,主动检视自我,打扫身上的政治灰尘,不断增强政治免疫力。在推进自我革命的过程中,要坚持在二者的统一上下功夫、在二者的结合上使实劲,充分调动组织和个人两方面的积极性,确保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同步展开、同向发力、同频增效,把党的自身革命进行到底。

三、党的性质决定党具有自我革命的勇气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包括:

是由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决定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

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坚持党性的目的是为了坚持人民性。人民性以党性引领方向,人民性是党性的主要来源和根基,把党性和人民性统一到“依靠谁”和“为了谁”这个根本问题上。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集中表现为党与人民是利益共同体,是命运共同体,是血肉共同体,是精神共同体。党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就失去了执政基础,就失去了蓬勃生机、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就失去了血脉和力量的源泉。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就是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理念,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最终一定能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

是由党的初心和使命相统一决定的。初心和使命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初心决定使命,思想决定行动;使命是初心的延伸和展开,使命践行初心。初心使命是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的决心和信心,也使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成为历史的必然。习近平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可以看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党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复兴。在新的征程上,要始终把初心和使命一以贯之体现到党的全部奋斗之中,就必须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牢牢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牢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断检视自己,不掩饰缺点,不文过饰非,坚决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危害党的肌体健康的现象作斗争”。

是由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相统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

利益。”共产党人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也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集团、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共产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是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客观基础。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深深镌刻在了自己的旗帜上。一百多年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建设社会主义、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和人民始终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这是党能始终坚持自我革命的政治基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1945年4月,毛泽东又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作了深入论述:“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回答:“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由此可见,党和人民利益共同体的高度一致性,决定了党坚持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关键是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锻造,使自己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党的自我革命依然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党内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党也面临着“四大挑战”“四大考验”,少数党员干部存在着“四化”的现象:一是自我革命精神淡化,主要表现是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二是批评能力弱化,主要表现是明哲保身、装聋作哑;三是检视问题能力退化,主要表现是患得患失、讳疾忌医;四是骄奢腐化,主要表现是目中无纪甚至顶风违纪,违犯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屡禁不止。习近平形象地把这“四化”比喻为“心中贼”。他指出,党员干部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命意志就会衰退,就会违背初心、忘记使命,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罪”。“四化”现象的存在,是新形势下坚持自我革命的大敌,而杜绝“四化”也是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然要求。只有毫不动摇地消除党内存在的“四化”现象和一切违背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问题因素,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党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克服缺点,才能大力弘扬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把党建设成为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住风险考验、跳出“历史周期率”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摘自《科学社会主义》2022年第4期
张雅丽/摘编校)

作者简介:楚向红,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王公龙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要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论述,对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更好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 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显著特点。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党的自我革命和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是有

机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是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强大动力,社会革命的新任务新挑战又对党的自我革命提出新目标新要求,两者是相伴相随、互促共进的辩证关系。伟大社会革命锻造和成就伟大的党,伟大自我革命保障和推动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从政治引领看,在伟大社会革命中,决定革命活动成败的是政治路线和政治方向,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方向,推进社会革命才能行进在光明的大道上。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从思想指引看,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为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夯实思想根基、铸就精神之魂。从组织保障看,严密的组织体系、强大的组织凝聚力是我们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深化党的自我革命,使党的各级组织健全完善、高效运转、统筹协调,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才能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制胜优势,为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提供强大力量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出了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在伟大自我革命的有力引领和坚强保障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同时,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依然存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就必须敢于直面问题,深刻把握党的自我革命宝贵经验,不断深化对推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

深刻认识大党独有难题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也有大的难处,如何确保全党在共同思想理论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尤其不易。”中

国共产党“大的难处”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从基本性质看,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会面临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蚀。从数量规模看,我们党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党的组织层级多、管理链条长,会面对世界上许多规模较小的政党所不曾面临的难题。从保持先进性看,我们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新征程上,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就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持之以恒地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一是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三是始终牢记“三个务必”。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四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强化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保障,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下转第50页)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核心要义

张文显

把宪法作为根本活动准则,实质上是要把宪法制度更好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效能。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完善宪法,就是要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以宪法引领和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观的制度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说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决不是其他国家的宪法;我们实行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宪法长期执政、全面领导、治理国家,而决不是要否定和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首要的是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动摇。这事实上指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

把宪法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活动准则

把宪法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活动准则,这是“依宪”的本义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全党全国要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不断提高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水平。”尤其是“我们党首先要带头尊崇和执行宪法,把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

把宪法作为根本活动准则,其基本要求包括:一是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以宪法为最高法律规范,在宪法规范和宪法精神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依据宪法确立的职权和程序开展各项工作。二是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率先垂范,将恪守宪法作为根本活动准则,为全社会树立维护宪法权威的榜样。三是一切规范性文件都必须符合宪法精神和宪法规定,接受合宪性审查,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精神和宪法规定的规范性文件都要依法撤销和纠正。

把宪法作为根本活动准则,实质上是要把宪法制度更好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效能。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完善宪法,就是要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以宪法引领和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通过制定和实施宪法促进相关制度更加科学、协同、规范;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通过宪法蕴含的治理标准和治理工具来提高制度的执行能力。实践证明,通过宪法法律确认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保障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稳定性,逐步实现了国家治理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法治化。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我国宪法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的法律地位。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我国宪法的根本要求,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题中要义。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严格按照宪法和党章的明确要求,带头厉行法治,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塑造安全、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要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指出:“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既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应有之义,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要贯彻落实宪法规定,进一步推进党的领导入法入规。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要明确规定党领导相关工作的法律地位。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各级党委依法决策机制,提高党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同时,也要重视宪法和党章的有效衔接,不断完善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融贯衔接,持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人民民主的法制载体,是人民权利的根本宪章。因

而,“人民”构成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目的。

必须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切实保障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是每个公民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

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原创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我国宪法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制度成果,也是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制度保障,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相互蕴含、相互促进的关系。

必须秉持社会公平正义这一崇高价值,切实维护和发展社会公平正义。我国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之一就是“共同富裕”为显著特征的社会公平正义。因而,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必须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持续不断地完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制度体系,使法治建设和法治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并通过宪法法律有效实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坚持和完善宪法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最重要的是坚持、巩固、完善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通过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优势,夯实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前提下,从我国国情出发,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必然要求。要坚持守正创新,加快健全和完善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制度。要依据宪法制度体系,从实际出发,继续加强制度创新,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及时总

结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将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及时上升为制度,转化为宪法法律。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要强化制度的执行力,使各项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好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践效能,推动“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有效衔接、相互促进。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关键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法治道路。也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按照宪法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国家政权体制和活动准则,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实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有合理分工又有相互协调,保证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保证国家机关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要根据宪法确立的体制和原则,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正确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要在宪法精神的指导下,适应扩大人民民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已经成功开辟、坚持、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法治道路,并将其铭记在我国宪法序言和各项规定中。

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既是对全面依法治国的引领,也需要以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为基

础。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总目标、总抓手,以法治中国建设规划为总体框架,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实现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通过合宪性审查全覆盖的工作机制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各个部分和环节始终建立在宪法精神和原则的基础上。

要全面深化法治领域改革,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率先突破。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制约,确保司法公正廉洁高效权威。创新普法和法治宣传教育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让法治成为全社会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完善人权法治保障机制。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积极参与国际法治建设,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在宪法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这些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主要内容,也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具体展开,是我国宪法精神滋养法治体系而生成的法治中国样态。

(摘自《北京日报》2022年12月12日
张雅丽/摘编校)

作者简介:张文显,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论集中力量办大事显著优势的形成机制

——基于“组织领导—吸纳整合—监督保障”的分析框架

宋雄伟 刘 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 13 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最大程度地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最大范围地集合了人力物力财力,充分有效地调动了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总体来讲,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有着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历史逻辑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想创新,实践逻辑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历程、办成了一系列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细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研究,构建了“组织领导—吸纳整合—监督保障”的分析框架(见图 1),系统阐述了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显著优势的机制,试着为解释“中国之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提供学理性的新注脚。

机制是根据一定的原则,采用适当的形式,划分和确定各组织和个体的职责、任务,协调其行为的较为固定的方式、方法。它们是动员和挖掘内部人力物力资源的重要手段,能够

把分散的、微弱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集中的、强大的力量,也能够通过规范化的组织程序,把个人和组织的活动纳入目标所要求的轨道,并为发挥个人智慧和才干开辟道路。集中力量办大事需要在组织领导、整合吸纳、监督保障等方面形成相互协调、共同作用的机制,才能够将国家、市场、社会和个人全面覆盖并有机整合起来,解决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各种问题与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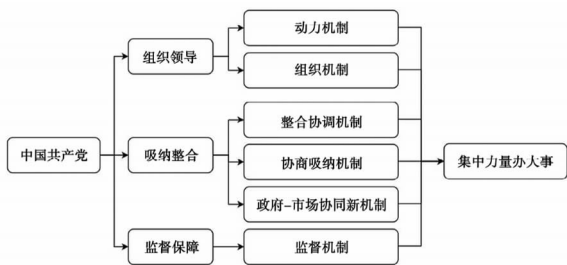


图 1 分析框架图

组织领导机制是指以组织化的形式实施全域动员,以自我革命的内生性领导机制为基础,形成共同意志、凝聚强大力量的方式、方法,它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原动力和强大的组织体系。组织领导是指由人、环境、目标和特定结构层次组成的有机体系,它往往与目标、职责、职位、效率等概念相关联,是“事物内部及其与外部按照一定结构与功能关系构成的方式和体系,同时也是由人群组成的一个力量协调系统”。

吸纳整合机制是指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的方式、方法,它注重各个领域和各个区域之间

的统筹兼顾,注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有效协同,使各项政策配套耦合,在协调均衡中形成“一盘棋”的整体效能。吸纳整合形成政治认同,促进政治参与和政治调控的有序化以保障政治稳定,能够有效控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冲突的程度和范围,促进社会和谐,形成资源合力。

监督保障机制是保障公共权力合法运行,维护社会公正和民主程序的各种监督手段与方法,形成党内监督与国家机构监督相贯通,与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等方式相互协调的系统性监督机制,它能够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重要的保障机制。监督保障的内在逻辑是同步健全党和国家两套监督系统,“在充分发挥各自功能的基础上实现高度协调、深度融合,形成由分散到统一的权力监督合力”。有权必有责,滥权必追责,严密有效的监督保障机制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支持,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一、组织领导:内生性动力机制与上下贯通的组织机制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领导机制,形成了以自我革命为内生性动力和上下贯通的组织体系为组织力量的机制安排。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如果中国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并坚决维护其权威,加强了集中统一领导,进而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使自身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世界上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鲜明特质的政党。

(一)内生性动力机制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到“窑洞对”,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能够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原因在于让人民监督和进行

自我革命。集中力量办大事依靠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生性动力机制,始终确保中国共产党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不断进行思想理论创新,回应时代之问,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第一,形成了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政治逻辑的机制。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党的初心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领导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坚持不懈锤炼党员、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形成了坚持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全党、团结人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工作,夯实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的工作机制。

第二,形成了以“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为制度逻辑的机制。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不断扎紧制度的牢笼、使制度治党成为一以贯之的主题,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不断完善依规依法治党,建立健全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工作机制。

(二)上下贯通的组织机制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是以党的组织体系建设、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和党员队伍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活动,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完成党的全部工作的重要保证,是党领导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中国共

坚持底线思维

胡长栓在2022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撰文认为,底线思维是新时代新征程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必须不断提高的科学思维能力。底线思维是一种富有哲学智慧的思维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风险,体现了底线思维。底线思维还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坚持和运用。坚持底线思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是有效应对我国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必然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并不是保守被动,被风险吓住不敢作为,而是要心中有数、处变不惊,做到“有守”和“有为”有机统一。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充分的预见和准备,把应对预案准备得更充分更具体,同时又要抓住机遇,促进事物向更好方向发展。坚持底线思维,要对那些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加强研判、全力防范,把底线牢牢守住。既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

世界现代化历程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欧阳康在《决策信息》2022年第9期撰文认为,100年来,在世界由现代化走向全球化、主要大国实力消长的大背景下,中国能够从近代以来的衰败落后到今天站在世界大国前列,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化最初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引领的,其本来含义包括理性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六个方面。现代化在人类文明进步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其固有的价值二重性,也给社会带来了出现“单向度的人”、社会单一化、金钱崇拜和世俗化倾向、“都市病”、极端个人

主义思潮、效率与公平对立等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现代化开始向全球化阶段过渡,在两大阵营对立结束后,“一超多强”格局形成,东亚、拉美国家相继崛起、世界体系逐渐不以意识形态为主导、而以现代化的程度和水平来划分,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也逐步多样化,并产生比较与竞争。近代以来中国对于现代化经历了畏惧、追寻、脱离、误解、拒斥,创造的认识阶段,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实践中开启了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深刻把握新时代治国理政方法论特征

刘建军在2022年9月26日《北京日报》撰文认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方法论的论述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注重有为主体与有效方法的内在统一。从调整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入手来论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一种方法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治国理政方法,既是思想方法,又是工作方法,体现了治国理政方法论的全面性和有机整体性。我们不能将二者分割开来,简单化地认为某些方法只是思想方法,而另一些方法只是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方法的论述,特别是关于基本方法的论述,都是顶层设计层面的指导性方法,属于战略思维,对战术思维具有指导作用。从方法论视角把握这些鲜明特征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不论是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来说,还是从党治国理政的丰富实践来看,都有着显著的方法论自觉。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注基层工作,关心年轻干部的成长,因而在论述战略思维方法时总是与战术思维相结合,

对于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具有具体指导意义。

我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何在

谢菲、岳经纶在《公共治理研究》2022年第3期撰文认为,从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变迁、政策企业家三个视角可以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随着中央对社会政策的重视,在多任务目标环境下,地方竞争开始从经济领域发展到社会政策领域;中国政治体制下的政府创新蕴含深刻的制度逻辑;政策企业家是政府创新的重要推动者和政策创新的催化剂,不同类型的政策企业家在政府创新中的策略各不相同。政府创新的深化需要推动地方政府间的良性竞争,优化有指导价值的制度供给,充分发挥政策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政府创新是国家治理有效性和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由地方政府创新生产的有效而合法且被国家整体性制度所吸纳的经验支撑了地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多元性。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创新也出现了问题。当前我国政府创新中存在的制度、竞争和主体方面的问题对于如何进一步深化创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一是要促进地方政府间的良性竞争,把官员的升迁与创新政绩过度关联对于创新的可持续性会产生不利影响。二是要优化创新的制度安排,注重政府创新生态的构建。三是要重视政策企业家的作用。

新型腐败的特征与类型

毛昭晖、朱星宇在《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4期撰文指出,新型腐败嬗变存在三个阶段与三种方式。三个阶段是:腐败个体的蛰伏期、腐败文化的内化期和腐败互联的攀爬期。三种方式是:替代,是指传统型腐败逐步被抛弃,贪腐者用前所未有的腐败方式取而代之;

转换,是指为给腐败披上合法外衣,采取“偷梁换柱”、“移形换位”等伎俩,将违法行为转变为合法行为。混搭,是指运用权力将某种资源与正常的经济活动进行混合搭配,在摆脱违法犯罪构成要件约束的基础上,获取腐败收益。新型腐败存在四个基本特征:腐败主体的关联性从线性结构向网络结构嬗变。腐败共同体通过引入、重组、增强和分散等手段对腐败交易结构进行改造,主体之间呈现多中心合作网络结构、金字塔结构等网络结构关系;腐败收益从显性因果向隐性因果嬗变。贪腐者通过切断利益输送的关联性、刻意拉开双方利益交易的时空间隔等方式,淡化利益交换的显性因果,强化隐性因果;腐败收益从违法利益向合法利益嬗变。腐败的行为选择,从不合法利益的攫取向合法利益的获得转变;腐败工具从传统型工具向智能化工具嬗变。腐败主体利用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与金融工具相结合实施腐败,提升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和安全性。新型腐败表现为四种基本类型:“隧道挖掘”利益输送型腐败、“俄罗斯套娃”隐匿型腐败、“未公开信息”套利型腐败和“软权力”影响力型腐败。

民生为先:乡村治理的基本遵循

吴业苗在《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6期撰文指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夯实乡村治理基础。然而,乡村治理一直是国家治理的弱项,存在诸多短板,不仅乡村治理水平低于城市,需要与城市治理对接、并轨,而且乡村治理中重管理、轻服务的问题突出,导致乡村民生事业发展缓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改善乡村民生提供了新机遇,但一些地方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并没有将工作重心放到民生

问题的解决上,出现了乡村振兴与民生改善相悖的现象,甚至造成新的民生问题。尤其是强力改造村庄、强迫农民集中居住或进城的治理方式,让部分农民的民生权益在乡村振兴中受到损害。新发展阶段的乡村振兴,要以“民生为先”为基本遵循,不仅要解决城乡发展失衡和乡村发展滞后问题,促进城乡全面、深度融合发展,而且要补上乡村民生的短板、强化乡村民生的弱项,满足乡村居民“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需要。唯有在乡村治理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乡村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更有效地推进乡村实现振兴和更扎实地推进共同富裕。

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可从七个方面发力

魏琪嘉在《中国发展观察》2022年第7期撰文指出,“十四五”时期,确保国家产业发展安全,抓住战略机遇期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至关重要。同时也要看到,补齐短板是一项复杂工程。因此要坚持系统观念,这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发力。一是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技术研发前期侧重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优势,抓紧推动技术路线图落地实施。二是多措并举支持传统产业技改。避免传统制造业空心化,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三是健全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强化共性技术研发,组建工业技术研究院,推进成熟技术转移和产业化;健全国家级创新平台研究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四是夯实工业基础。重点围绕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技术促进制造业质量全面提升。五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合理空间布局,对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有效支撑。六是积极稳妥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加强战略资

源储备,筑牢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坚实物质基础。七是发挥制造业投资对于补短板强弱项的促进作用。

加快推进大数据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

许安明在《求索》2022年第4期撰文指出,大数据以数据和技术要素融入文化产业,在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促进了大数据技术创新。一方面,大数据以数据要素投入到文化产业,降低生产成本,产生乘数效应。另一方面,大数据以技术要素投入到文化产业链的创新、生产、传播、消费等各环节,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率。然而,大数据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过程中面临数据流通不畅、企业应用动力不足、行业垄断等现实困境。为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推进大数据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第一,加快文化领域数据开放共享,降低数据获取成本。一是构建文化大数据标准规范体系;二是构建文化产业领域数据交易服务体系;三是加强政务领域文化数据资源开放和利用;四是健全知识产权和隐私保护机制。第二,培育壮大市场主体,释放融合发展动能。一方面,通过金融服务、税收补贴、项目支持等方式,鼓励大中型文化企业开展数字化业务;另一方面,加强数字文化产业孵化器创业服务平台建设。第三,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促进文化产业结构升级。第四,加强融合关键技术攻关,提升文化产业市场竞争力。第五,健全人才供给体系,强化融合发展复合型要素保障。

(张雅丽/编校)



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

第一,形成了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领导机制。恩格斯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深刻地论证了权威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健全完善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强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职能作用,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确保令行禁止。《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

第二,形成了依靠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机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之所以能体现强大的组织功能,实现全党智慧、力量和行动的一致,根源在于将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处理党内关系,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形成了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识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这种机制既能够广泛听取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在有序民主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激发和凝聚全党的创造力;又能够整合正确意见,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决策高效、执行有力。

第三,形成了执行有力的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按照党章规定建立健全党的各级各类组织,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涵盖党的纪律检查机

关、党的工作机关、党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严密组织架构。从党组织的自身结构来看,自中央至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各级工作机关及纪检机关确保了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落实和令行禁止。从党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来看,各单位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党组、党委与广泛渗透于社会肌体中的基层党组织将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凝结为附着在政党骨骼上的血肉,从而实现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各级各类组织协同发力,形成了上下贯通的完整体系,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组织载体保障集中力量办大事机制的有效运行。

第四,形成了任人唯贤、科学规范的干部队伍培养机制。“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了甄选党的干部要坚持任人唯贤和德才兼备的原则。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建设干部队伍、凝聚人才力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培养机制。首先是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分级分类,因时因地确定干部的职责、权限、方式等,做好双重管理。其次是健全任人唯贤、人事相宜的干部选任制度,构建干部合理流动、奖罚分明、能进能出的人事体系。最后是对干部储备人才进行源头培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既突出政治素质,又注重专业能力,同时兼顾干部队伍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为形成上下贯通的组织机制奠定了人事基础。

二、吸纳整合:协调机制、协商机制与政府市场协同新机制

(一)协调机制:统筹跨部门跨层级

第一,形成了跨层级跨部门的议事协调机制。面对“不确定性、非经常性、跨部门性、任务重大性”的非常规任务环境,常规的科层治理存在不完备性和治理困境,议事协调机构作为跨组织合作的一种弹性化机制应运而生。一方面,它能够弥补组织内部因部门愈加细化、组织边界更为明确所造成的部门职能分工

的裂痕;另一方面,它与多变的非常规性任务环境匹配程度更高,具备较高程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从而能够形成高度的内部凝聚力和对社会资源的强大提取力。总的来说,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议事协调机制。

议事协调机制包含协调和整合两方面的功能,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其虚实结合的领导系统和执行系统。这一系统由组长、参与部门和议事协调办公室共同构成。其中,组长主要由党政负责人担任,因其双重权威身份而具有足够的权威和资源整和能力去协调并动员相关人力、物力和财力,以自上而下的动员形式推动共识型决策的启动。小组成员由其他职能部门行政领导担任,能够促进各部门间的沟通和信任,改善部门间利益碎片化的困境,弥补各部门间的裂痕。议事协调办公室作为执行系统,将领导系统在会议上达成的共识性决策付诸实践,通过督办和考核来达成政策落地的最终目标。

议事协调机制还构建了“共识型决策—专项责任制—强大执行力”的行动共同体,形成了调配资源、整合各职能部门职责的重要机制。这一机制既能节约部门间资源交换和沟通的成本,又拥有高层领导支持和认可而来的合理性,形成了“下需求、上支持”的行动逻辑,以其精巧的治理结构设计保障了高效的资源整合能力、完善的部门协调能力,为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强大的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

第二,形成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性的统筹协调机制。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性既能实现政令统一,又能兼顾局部利益;既能维护国家集中调控权,又能赋予地方必要的、灵活机动的权力。积极性主要体现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上,包含事权的划分和财力的匹配两方面。发挥两方面积极性的机制关键在于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一方面,优化事权事责配置,通过划分中央事

权、地方事权、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建立了明确的权责关系,逐步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的工作体系,探索出一套能够同时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坚持财政事权由中央决定。通过推动地方政府按照中央授权履行财政事权责任,减少中央对微观事务的直接管理,明确政府间财政事权划分争议的处理,完善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和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实现权、责、利相统一,从而解决当前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缺乏法律依据、规范程度欠缺等问题,健全现代财政制度。

此外,试点先行,稳步推进是统筹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性的重要机制。中国共产党把制定长期政策目标和广泛的政策试验结合起来,中央设定大的政策目标,在地方设立试点或试验区摸索具体的实施方法,然后总结试点经验,以点带面、以点串线地推广到其他地方,实现探索、试错、纠错、前进的螺旋式发展。试点先行、由点到面的工作方法既实现了改革的蹄疾步稳,也将地方的创新精神融入中央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促进了中央和地方的良性互动,提高了政策的创新力和适应力。

(二)协商机制: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

第一,形成政党吸纳机制。经由政党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双向扩展,通过“精英吸纳”、扩大社会参与、同化吸收新的社会团体、动员发展和培育社会组织,形成引领、整合与同化并存逻辑下的“政党吸纳社会”的过程。它既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对各个社会群体的直接吸纳,也体现为通过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实现的间接吸纳。这激活了国家治理的社会资本基础,厚植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使得中国社会的不同群体获得了参与国家治理的组织化路径,同时构建起这种参与体系的政党中心主义向心力,不断将新社会群体吸纳其中,“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

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

此外,还形成了党建引领的多元整合机制。“中国共产党为推进社会一体化,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或机制对社会子系统及各构成要素之间关系进行协调,进而提高社会良性运转与发展能力的过程和状态。”从整合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整合是以党建为引领的多元整合机制。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增强“执政党—政府—群众”的互动性,形成了“密织组织纽带—整合治理资源—强化基层认同—制度能力建设”的有机体系。从整合客体来看,它为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提供了理性对话平台,建立了政党、政府、社会、市场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化通道,为完善“集中社会力量”的制度体系建设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机制。

第二,形成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机制。“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协商民主的宏观架构中包括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和机制。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机制成为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一环,既强调人民在投票时的权利,也保障了人民在投票后的全程参与,形成了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从政策制定的视角来看,协商机制充分运用在广泛的公共决策过程中,在审慎平等的论证与对话基础上,充分表达和转化各社会行为主体的价值和利益偏好,达成政策层面的共识。协商机制可以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听取意见和建议,接受批评和监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多种形式的协商,有效克服了不同主体为维护 and 争取各自利益而可能出现的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有助于达成共识,发现和修正错误。从治理效

能视角来看,协商机制能够保障合乎民意的政策出台,又能减少在执行政策层面可能出现的社会阻力,进而起到化解社会分歧、改善干群关系、增强社会信任的作用,发挥调节器与黏合剂的功能。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2016年,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离不开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离不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塑造良性的政府、市场互动模式,其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从广度和深度上协同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实践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激发市场活力,关键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发挥决定性作用,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习近平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有为政府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以及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弥补市场失灵的机制,既打破了行业垄断、进入壁垒等有损维护市场统一的行为,让市场充分高效地配置资源,又防止出现市场秩序不规范、不完善,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等现象。有为政府既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工作,又在民生建设中织密网、建机制,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

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有为政府还通过保障底线公平发挥其“社会稳定器、调节器和缓和器”作用，黏合社会力量。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形成了新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济驱动力、行政保障力与社会创造力，既能够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动力，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又能够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克服和弥补市场的不足和缺陷。

三、监督机制：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其他监督方式

（一）系统的党内监督机制

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贯注重监督机制建设。中国共产党建立健全了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以及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这充分保证了党的组织充分履行职能，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在集中力量办大事过程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二）国家监察体制的统摄机制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以建立集中统一和权威高效的监察体制为目标，“强化了监察权运行职权一体化配置”。它尝试将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有机整合起来，使国家监督更加统一、规范。各级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有助于克服自我监督“主体不清晰、对象不明确、机制不健全”，以及“陷入同体性、低效性”等问题，或缺少能够统筹多种监督力量的行权主体的问题，实现了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全覆盖，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和机构能够有效起到支撑作用。建立健全国家监察制度法规，构建中国特色监察法制体系。一方面，“纪检立规”与“监察立法”相协

调，有助于内在形成监察法和党内法规统一和谐的监察规范体系。另一方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配套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持续弥补原则性立法模式可能产生的规范空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为监察官依法履行职责、强化对其监督和队伍建设提供了法律支撑。同时，推动审计监督与党和国家监督衔接贯通，增强审计在监督体系中的监督合力，更加注重制度设计的政治性与组织领导的统摄性。

（三）形成多种监督方式协同发力的机制

习近平提出，建立健全多层次监督体系，使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监督和制约与政协监督有机结合，“完善民主监督的组织领导、权益保障、知情反馈、沟通协调机制”。推进司法管理体制深化综合配套改革，构建激励约束、严密规范的司法监督体系。通过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完善各类公开办事机制，使得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在权力监督机制中的作用逐步增强，权力运行不断规范化和公开化，有效压缩了权力的暗箱操作空间。此外，督查机制多样化的信息采集渠道、“一沉到底、全面覆盖”的组织方式以及相对更长的驻场时间降低了代理人信息隐藏的成功率，缓解了上下级政府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督查机制还打破了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中包装政绩、回避问题的倾向，突出了问题导向，查找问题及时、准确、全面，打通了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通过一次次强力督促，真正确保党中央的政策落地生根、有效贯彻。

（摘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3期 张雅丽/摘编校）

作者简介：宋雄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徐康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3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会议提出五个方面着力点,其中之一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and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必须深刻认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

一、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基础与实力标志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基础,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和体现发展实力的重要标志。经过新中国7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时代赶超,中国已经建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结构相对完整的现代产业体系,并在部分产业领域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新时代十年的艰苦奋斗,更使各个产业发展实现了新的历史性跃升。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产业发展仍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产业科技含量不高,全要素生产率偏低,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仍处于中低端的水平,产业链上有薄弱环节和明显短板,影响产业发展安全,产业体系不牢固、不够健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要从生产力上形成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强大物质支撑,从而奠定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基础。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既是事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长期任务,将贯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全过程,也是当前经济工

作的一个重点,必须从现在起就要开好局、有作为。首先,产业的发展是经济的基础,是创造国民财富的源泉,促进经济恢复发展要从产业活动迅速升温开始。其次,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扩大国内需求提供了基础条件,有利于需求的迅速扩张。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增加产业投资,尤其是对新技术、新设备、新产能的投资,势必会通过投资渠道扩大国内需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构的过程,也是各种新产品、新服务和新的消费场景不断问世的过程,这又从消费渠道上扩大了国内需求。此外,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然为创新发展构建新的空间。创新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也必然推动新的一年的经济向上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攻方向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要和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保持一致,突出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同时,针对当前经济发展特点,把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促进经济恢复发展的主要着力点,以提升产业层次、补齐产业链短板、抢抓产业新机遇、完善结构体系等作为主攻方向。

以科技创新全面提升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发展实现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我国制造业总量规模已多年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

近30%，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于世界制造业强国，但我国制造业投入的人力成本、资源总量过多，人均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在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中总体上仍处于技术含量不高的一般制造和加工装配的地位。假如我国制造业的层次和效率能够达到制造业强国的水平，行业的增加值规模将提升一倍以上，将大大加快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全面提升我国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必须作为重点加以推进。

围绕重点产业链，分阶段分步骤补齐短板，实现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破，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发挥体制优势，集中优质资源打攻坚战，坚决把一些急需紧迫的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确保产业体系的自主安全。突破重点产业链的关键核心技术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更不是仅凭热情和斗志就可以补齐所有短板的，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产业发展中的科技问题。要聚焦可行的重点方向，分轻重缓急、分阶段加以突破，重点在具有先发优势的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的基础前沿技术领域实现攻关突破，以此带动全产业链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在产业先进技术上仍要走国际合作的道路，以开放的思维对待技术问题。

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提升农业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支撑力。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也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大背景下，在国际政治经济动荡不定、风险因素不断加大的形势面前，我们必须把粮食安全紧紧抓在自己手中，确保农产品供应链安全可靠。推动农业现代化，不仅事关粮食供应安全，还涉及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生产方式来改造和提升农业，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程度，促进农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

展。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要有现代化的农业。

加强能源、资源和重要物资产品的生产与储备，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升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中国是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大国，能源、资源和重要物资产品的供应极为重要，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标志。我国必须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在确保传统能源探明储量增加和产能扩大的基础上，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力度，着力提升新能源在能源体系中的占比。对于重要矿产资源，要加大勘探力度，力求总体上平衡够用。要有风险观念和危机意识，充分估计各种突发情况，对一个大国可能遇到的包括原料、食品、药品在内的物资供应短缺风险要做出提前预判，全面提升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

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机遇，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领域开辟新赛道，创建产业发展新优势。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领域基础较好、起步较早，抓住时机集中资源加以突破，可以开辟新赛道，形成发展的新优势。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发展基础，各种新技术都在加快研制开发，各新兴产业间相互融合渗透发展的势头也较好，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各产业发展，再加上我国在发展产业园区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完全可以有大的作为。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重塑国家竞争的新优势。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正在改变国际经济竞争格局。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尽显身手，这是对数字平台企业作用的充分肯定。应鼓励支持更多的数字平台企业在技术、模式和业态上加快创新，带动更广

泛的就业,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发展数字经济,最具有潜力的领域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要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全面提升实体经济的发展层次和发展效率,下大力气推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

三、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

全面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促进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应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产业发展的现代化水平是由千千万万个企业的技术水平、效率水平和经营水平所决定的,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需要企业发挥担纲作用。企业要善于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力量,围绕产业链部署和整合创新链,坚决打赢这场十分关键的攻坚战。

打造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发挥这些企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定海神针作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要有一批创新引领的世界级企业,能够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中占据支配地位,形成在技术标准、价格制定、供求关系等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世界一流企业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具有引领产业链、影响供应链的特殊作用,必须用力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打造要紧扣“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标准,对标看齐国际同行著名企业,同时体现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的特色。

培育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行业“单项冠军”或“隐形冠军”。构成一个完整的现代化产业,不仅要有若干个世界级企业

和一批分行业的龙头企业,还要有数量众多的从事专项经营或以零部件配套见长的中小型企业。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必须从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入手,不求规模世界一流,也不苛求世界著名品牌,而是要培育发展一大批在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创新能力方面有独特建树,形成某种独特竞争力的“小巨人”企业。这些企业可以成为行业的“单打冠军”或“隐形冠军”,构筑起产业现代化的坚实基础。

为各类企业创新营造更好环境,促进企业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发挥生力军作用。为使企业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有力微观基础,必须向企业投入更多的要素,使企业可以调动运用更多的优质资源。当前尤其要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和人才问题,破除困扰企业发展的瓶颈。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创造条件让更多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要改革现有的人才制度和科技成果评价制度,下大力气扭转一流人才不愿到企业的社会价值取向,促进更多的优秀人才尤其是高层次创新人才向企业集中。企业拥有了一流的创新人才,才有可能创造一流的技术和产品,现代化产业体系才有坚实的微观基础。

(摘自《红旗文稿》2023年1月2日)

张雅丽/摘编校)

作者简介:徐康宁,南通大学特聘教授、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农业公司化是农业现代化必由之路

李 静 陈亚坤

一、关于农业现代化微观主体的观点评述

农业现代化是指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农业现代化尽管有各种定义,但综观世界现代化发展理论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农业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的一部分,有两个核心驱动力:一是市场机制,二是科技进步。亚当·斯密证明了个人出自利己的动机通过市场自由竞争,可以让产品更加丰富、成本更低、社会资源分配更有效率,从而使整个社会财富增加。市场机制和工业革命导致的科技进步使人类进入了财富快速增长的现代文明时代,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科技进步与市场机制的结合使人类财富进入了一个可持续的累进增长状态。中国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依靠市场机制和科技进步,中国迅速实现了生产力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和综合国力的世界第二。相比之下,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水平明显落后,小农户、小规模土地经营依然是农业经营的主流,因此,党的十九大强调要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农村改革以来,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和发展,并为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是,这些新型农业经营组织能够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最重要的微观主体,并带领小农户进入现代化吗?对此学界也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多年来基本有三种观点:小农户基础论、农业合作社论、

农业公司论。

(一)小农户基础论

这一观点认为,“大国小农”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小农户还会占中国农业经营主体的大多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基础。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未来部分劳动资源将逐渐退出农业生产,因此,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但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通过为小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来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衔接。这一观点是目前的主流观点,也成为中央农业政策的出发点,即“坚持小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与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为引领相协调,坚持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充分发挥小农户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按照服务小农户、提高小农户、富裕小农户的要求,加快构建扶持小农户发展的政策体系,促进传统小农户向现代小农户转变,让小农户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小农户基础论”既受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制约,也受到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理论的影响。舒尔茨认为,可通过对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改变传统小农户,实现现代化。这一观点是坚持家庭承包制长期不变的理论基石。改革开放以来前30多年的实践也说明这一战略是奏效的,通过高投入,实现了高产出。

速水佑次郎和拉坦认为,舒尔茨理论没有

充分体现新型投入的供给和生产资源的分配问题,新型投入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而是应由农业革新者、社会研究机构和农业公司组成。可以说,舒尔茨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农村改革早期的农业成就,而速水佑次郎和拉坦的理论可解释中国农业近些年在产业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已经转移到非农和城市,农村基本上只剩下了老弱病残的劳动力。这样的小农户和建立在小农户基础上的家庭农场不可能成为市场主体,靠这样的小农户也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已进入新阶段,需要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农业现代化需要新的生产经营主体,而这一新型主体不应是小农户,小农户需要新的经营主体带动才能进入现代化。

(二) 农业合作社论

这一观点认为,中国小农户的出路在于将小农户组织起来,成立农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合作社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保护小农户的利益,并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合作社论”的理论来源有两个:

一是马克思的合作化理论。19世纪中期,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出现了合作社形式,包括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并逐渐形成社会运动。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合作社不仅是改造传统小农户的形式,而且是改造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因而是建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马克思的合作化理论进行了创新与发展,认为应该将马克思合作化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主要表现在,农村改革后不久,中央政策上认为家庭承包制具有合作制性质,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1983年的

“一号文件”)认为,“联产承包制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必将使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这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此后,中央连续16个“一号文件”都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在2006年还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法律形式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该法总则中第二条明确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合作化理论通过中国农村改革实践已实现了理论创新,合作社也成为小农户的专业经济组织。

二是国际合作社联盟所代表的合作社理论。这一合作社理论承认私有产权,认为合作社是建立在私人产权上的私人自愿组织,是另一种企业形式。从发达国家实践看,合作社早期背景是保守的欧洲教会为了反对工商资本和社会主义而将农村的政治倾向与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而发起的运动并取得了成功,因此,合作社带有明显的政治和宗教色彩。早期的合作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小农自耕农在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方面具有优势,优于大型农场主,一旦农业生产由劳动密集变成资本密集,上述小耕作的优势便告消失。随着合作社发展壮大,合作社市场竞争优势的丧失由政治上的优势和特权所取代,合作社成为影响政府政策的压力集团,其保护农民利益的方式已不是通过合作获得规模优势等市场竞争手段,而

是通过影响政府决策,利用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信贷优惠等政策手段而取得。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有经济学家对合作社提出批评。

另外,主张农业合作社论的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不论是欧美大农场制下的合作社还是日韩小农制下的合作社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其共同的变化趋势是农业公司化和合作社公司化。

从现实看,中国合作社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合作社需要政策上的支持和保护。另外,中国合作社还存在一个特有的问题,即“假”“空”“弱”。“假”即很多运行中(主要是运营得比较好的)的合作社并不是规范的合作社,而是由工商资本还有基层乡村干部入股成立的私营公司或股份公司,也就是有些人所说的公司领办的合作社。这些实质上的公司以合作社名义是为了套利,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几乎很少见到。“空”即很多合作社成立的目的不是帮助和保护农民,而是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或申请财政项目等,因此存在着大量的空壳合作社,空壳社现象在各地普遍存在,且比例较高,至少在1/3以上,一些地区甚至达到了60%以上。“弱”即合作社多停留在为农户提供简单的市场信息和技术服务,处于价值链低端,没有营销市场渠道,也不能实现农产品增值。

2019年,针对这些问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11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先后印发了《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社”专项清理工作方案》和《关于开展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的若干意见》,清理和整顿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合作社已逐步转型为以土地经营权租赁或者入股进而转制为以要素投入为重点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即合作社由劳动合作转为要素合作,合作社属性发生变迁,合作社与公司已没有多大区别。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考察时明确指出,“合作社的路子怎么走,

我们一直在探索”“要鼓励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合作社,探索更多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路子来”,这一指示大有深意,不仅指出了合作社发展的不足,也为合作社未来指明了方向,即合作社发展不能只有一种模式,而是应因地制宜多样化发展。

(三)农业公司论

农业公司论的基本逻辑是现代化有两大推动力,一是市场机制,二是科技进步,只有公司和企业家才是市场的主体,也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主体。早在1945年张培刚在其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就提出工业化是包含着农业现代化的工业化理论。早见雄次郎和拉坦认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新型科技知识持续不断的出现和工商业资本的投入,而市场机制是保证这一必要条件的重要因素。

中国农村改革后,周其仁早在1988年在《改革面临制度创新:后包产到户阶段的深层改革》一书中就指出,农业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是需要一个组织载体,这一组织载体不是政府部门,因为政府农业部门不能遵守市场经济原则,也不是农民的自组织,如合作社,因为农民自组织的有效性一旦超出了集贸市场的狭小范围,便因外部风险过大而明显降低,而是需要发展把产品和要素转化为商品的市场组织即公司。李周等也提出农业现代化的两个推动力是科技进步和市场机制,而且认为技术进步依赖于要素和产品等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通过市场机制诱导农业技术变革,市场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1993年,山东潍坊市率先提出了“确立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布局,依靠龙头带动,发展规模经营”的思路,随后农业领域出现了农业产业化理论和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政策实践。农业产业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牛若峰,他概括了农业产业化特点是生产专业化、布局区域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和企业管理化。从这个定义看,农业产业化的实质就是

农业公司化。“公司+农户”实现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是一条件符合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由于产业化龙头企业主要集中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后环节,农业生产环节的组织问题还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农业生产也应该企业化。例如,姜长云认为现代农业首先是市场化农业,必须是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是企业化、组织化农业。因此,现代农业的微观基础应从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转到以企业化、组织化经营为基础。应引导农民分化,使一部分农民转变为现代农业企业家,另一部分转变为现代农业工人。

综上所述,小农户基础论和农业合作社论都是从保护小农户利益而不是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角度来讨论问题,似乎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只要加大政府投资就可实现的自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保护小农户利益,忽视了农业现代化不仅需要进行制度推动和建设,还需要合格的微观市场主体。本文认同农业公司论,认为工商资本和企业家进入农业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和规模经营,只有公司才是农业现代化起引领作用的重要微观主体,也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推动者。从中国目前农业现代化实践看,越是公司化生产和经营为主的产业,其现代化程度就越高。如养殖业,尤其是蛋鸡、肉鸡、生猪、奶牛业等。对公司损害小农户利益的担心没有必要,小农户与农业公司不是天然存在着利益冲突,相反,公司与农户可以形成利益共同体。实际上,市场机制是一个不断调整、纠错和创新的动态过程,市场竞争机制所能做的事情比凭理性和经验所想象的要多得多。从现实中可以看到,公司可以参与农户家庭经营中的分工和专业化,如公司对农户提供各种社会化服务,农户也可以加入公司经营的专业化与分工,如成为农业工人或成为公司种养车间和基地等,农户与公司之间并不必然是利益冲突的关系。另外,小农户基础论、农业合作社论和担心小

农户利益受损的公司论者只想着要保护小农户,担心小农户破产,而没有看到小农户不利于现代化的一面,更没有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众多农村劳动力和家庭离开农业和农村进入非农部门和城市,不是因为公司损害了小农户的利益或政策没有保护好小农户而导致了小农户破产,而是小农户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主动选择离开收入低下的农业和农村。在人口出生率下降和体力劳动力短缺,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基本建立的今天,更应该担心的不是小农户利益保护,而是农业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率,更好满足人民的需求,建设强大、富裕的国家,而不是为了保护小农户。没有现代化,没有共同富裕,小农户也不可能得到有效保障。保护农民利益应该更多采用社会政策,而不是经济政策。另外,现在农民并非只有务农一条生路,而是有多种选择。

二、农业公司化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实际上,习近平早在2007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指出:“我国农业人口多、耕地资源少、水资源紧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不高的国情,决定了发展现代农业既不能照搬美国、加拿大等大规模经营、大机械作业的模式,也不能采取日本、韩国等依靠高补贴来维持小规模农户高收入和农产品高价格的做法,而必须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色,而农业公司化则是实现这一战略的最好选择。

(一)农业公司化是发挥中国后发优势的主要选择

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应在借鉴国内外农业现代化发展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施有为政策,避免西方国家走过的弯路,从而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西方国家为合作社提供了大量的税收优

惠、财政补贴、信贷补贴等措施,其合作社依然竞争不过农业公司,既不能提供创新与进步,也没能实质性地保护农民,所以西方国家合作社才在近些年纷纷转向公司化发展。我国合作社发展虽然有强大的理论支持,但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时期,经典意义上合作社的表现都差强人意。所幸的是目前绝大多数合作社都是基于股份基础上的合作,即实质上是公司。因此,只需要政策上防止对合作社的模式化或规范化干预,鼓励合作社因地制宜地多样化发展,就可促使合作社作为市场主体与农业公司平等竞争,成为公司性质的合作社。实际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17年)已体现了鼓励合作社的多样化发展。

(二)农业公司化是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主要载体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我国绝大多数小农户已经不再是小而全的经营单位,不仅农户间发生了分化,农户家庭内部各生产要素也发生了分离,全面参与了社会分工与合作。如工资收入已占农户家庭收入主要部分,参与流转的土地也越来越多,农户与农业公司实现了多种形式的联结与合作。一方面,农户家庭的生产过程出现了由公司承接的外包和服务,即生产的社会化服务,实现了由土地规模经营转向服务规模经营。另一方面,农户也参与了公司生产和服务的外包,一些龙头企业通过订单收购、保底分红、二次返利、股份合作、吸纳就业、村企对接等多种形式带动农户共同发展,与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使农户避免了直接面对市场风险。

(三)农业公司化是中国新发展阶段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农业公司不仅指目前所有的主要分布在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公司,也包括进入生产和生产服务环节的各种公司、在农村从事旅游、民宿、文化等第三产业的公司,以

及近几年新出现的与新业态、新产业相关的各种公司。支持发展上述各类公司是我国新阶段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就农业和农村来说,新发展阶段有以下特点:

1. 脱贫攻坚胜利和小康社会建成。中国对贫困农民已建立一套基本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制度保障了农民基本生活水平和权利,使农民不会再陷入绝对贫困。因此,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不必从保护小农户出发,而应从建设富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出发,公司制度从来都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关键。

2. 中国已是世界第一消费大国。中国已经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十四五”规划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这要求农产品及加工品生产不能从生产者出发,而应从市场、从消费者需求和权利出发,生产出高质量、标准化、多样化的消费品,而规模化、高质量、标准化生产只有现代化公司才能实现,小农户和合作社不可能满足这些需求。

3. 人口断崖和劳动力尤其是蓝领劳动力的短缺。这种状况一方面会制约我国经济增长,需要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如通过发展各类农业公司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会形成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才能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和消费。但另一方面会使劳动力成为短缺资源,农村劳动力工资收入会大幅增长,这就使得我国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不用担心失业问题和小农户破产。

4. 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的本质是节约劳动、节约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只有企业家才有动力去实现技术创新和运用新技术。企业家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因此,实施“创新驱动”要强化企业家创新的主体地位,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这不是靠管理部门坐在办公室里就能想出来的。什么技术该发展,什么技术发展不了,什么是

前沿、超前了多少,这些问题企业家更清楚。中国农业现代化也需要创新驱动,也需要企业家。

5. 破解种子等“卡脖子”问题迫在眉睫。农业农村部已经提出要以企业为主体,一体化配置资金、项目、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搭建规模化技术集成应用平台,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要让更多优势企业牵头承担种业科研攻关任务,要着力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研发能力、产业带动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种业重点龙头企业,发展一批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专业化服务能力强的“专精特新”企业。

6. “十四五”规划对农业农村提出新发展目标。如“推进农牧业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发展智慧农业,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数字化改造”、“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发展各具特色的现代乡村富民产业”、“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等。这些目标都需要以公司为主体,只有公司才能承担起这些发展任务,依靠小农户和合作社不可能实现这些目标。

(四)以农业公司为主体的地区和行业的现代化水平都处于国内甚至国际前列

从地区看,浙江省是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2021年初,浙江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光荣使命,率先探索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路。浙江共同富裕最主要经验就是市场化比较彻底,不论是在非农领域,还是在农业农村领域,公司都是最主要的市场主体。在农业生产经营领域,浙江很早就开始了由传统农业的小生产、经验作业和靠天吃饭状态提升为规模化、标准化、设施化和生态化的现代农业。在微观上,既表现为农业生产的设施化,也表现为农业经营

的企业化。早在2004年,义乌市委、市政府就下发了《义乌市农业企业化行动方案》,明确了农业企业化的核心是重塑经营方式和经营主体的改变,形成“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近些年,浙江省村集体经济也实现了“股份化改造”和“公司化经营”,形成集体经济与私营经济共同发展,走出共同富裕之路。2020年,浙江农村人均收入首次突破了3万元,连续36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所有县农民收入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6:1,首次降至“2”以内,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56,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小。

以行业来看,养殖业是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产业,一些龙头公司如中粮集团、新希望集团、温氏集团、现代牧业、牧原集团等带领下,畜牧业的标准化、规模化、自动化养殖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多数已达到国际领先。2020年全国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到67.5%,畜牧养殖机械化率达到35.8%,养殖主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小散养殖场(户)加速退出,规模养殖快速发展,呈现龙头企业引领、集团化发展、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趋势,组织化程度和产业集中度显著提升。2020年全国肉类、禽蛋、奶类总产量分别为7748万吨、3468万吨和3530万吨,肉类、禽蛋产量继续保持世界首位,奶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饲料产量2.53亿吨,连续十年居全球第一。

三、农业公司化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解决方案

学者们反对工商资本下乡和担心农业公司发展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公司发展会损害农户利益,这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但这一担心忽视了另一个现实,即公司与农户的关系不是静止不变的,应该看到,随着市场发展以及科技进步,中国产业化龙头公司与农户关系正从不平等的市场交易关系转向利益一体化的纵向分工合作关系,即公司或雇用农业工人直接从事生产,如牧原集团,或将生产分包给农户或

其他小公司(包括合作社),公司负责销售和开拓市场,如新希望、温氏等,实现了科斯所说的企业代替市场,这方面在畜牧业生产中尤其明显。

(一)“公司+农户”交易性关系存在的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山东潍坊出现了农业产业化实践以来,“公司+农户”就是农业产业化最主要的形式,农业农村部也对农业产业化企业进行了大力推进,截至2020年底,全国有县级以上龙头企业9万家,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1547家,省级以上近1.8万家,市级以上近6万家。其中,前100强的产业化龙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2.32万亿元,占1547家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68%,平均每家企业带动农户25万户;聘用农民工80多万人,占职工总数的58.5%,多数推行产加销一体化、贸工农一条龙经营模式,新业态产值占比达7.8%。在这些龙头企业中,尽管与农户的关系有多种多样,如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市场+农户等,但其最本质的关系都是公司与农户的关系。从现实中看,公司与农户的关系可分为两类:一是公司内部纵向一体化关系,二是市场上的交易关系。按照严格的产业化定义,即“产业化的本质是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外部经济内部化”,前者才是真正的产业化关系,而后者只是市场交易关系。自农业产业化兴起以来,我国早期的农业产业化企业与农户的关系多数是后者的市场交易关系,这导致了以下的问题:

1. 公司与农户契约关系不稳定。双方很容易撕毁合约,造成双方利益损失。一方面,龙头企业利用市场地位压级压价,损害农民利益,另一方面,农户掺杂使假,损害公司利益。

2. 双方地位不平等。这一点张培刚早就讲过,即小农户不是不能面对市场,而是面对的是不平等的市场,小农户在这样一个不完全的市

场当中,他们的利益会受到损害。

3. 地方政府有时会站在企业一边。一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和政绩,往往对引进的企业做出各种承诺,以保证企业利益,这使农户与企业利益有冲突的时候,政府不能作为客观公正的第三方进行调节,反而对农户进行打压。

鉴于以上问题,多年来专家和政府有关部门一直在呼吁公司与农户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甚至于一段时间内反对工商资本下乡,以保护农户的利益,这也成为发展合作社的最重要理由。但是什么才是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专家们并没有明确答案。实际上,只要是市场交易关系,龙头公司就一定在市场中占主导地位,不只是在与农户的关系中是这样,在与合作社甚至公司与公司的关系中也如此。从中国奶业的现代化过程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是市场是一个不断纠错和扩展的过程,企业家可以不断发现并纠正市场的错误,并从市场中学习和进步。因此,不能静态地看待市场的问题,人为干预并不能解决市场的问题。

二是小农户和合作社都不能形成对龙头企业的平等竞争,规模化牧场也不能,这是由其产品特性和市场地位所决定的。只有与龙头企业形成产业内部一体化的纵向分工,才能够解决产业链中各环节之间合理的利益分配问题。

三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不完全取决于生产成本的高低,而是市场规模大小和市场开拓能力的高低或者说是企业家能力的高低,中国奶业和乳品行业在生产成本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实现了现代化,应主要归功于企业家的贡献。

四是市场不是天然存在的,也不是一个有形的集贸市场,而是一个需要大量投资去不断发现和扩展的无形市场。消费者也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去发现和开发的,只有企业家才有积极性和能力去开拓和扩大市场,小农户和

合作社均不具备这个能力。

五是现代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特点是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交易。这完全不同于小商品经营和集市贸易。现代市场的交易主体不是小业主、小农户或小商小贩,而是企业家,需要的不是小富即安的小农思想,而是企业家精神和商业精神。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多半是交易出来的,而不仅仅是生产出来的。近些年,数字技术和互联网进一步放大了规模效应。

(二)“公司+农户”纵向一体化关系的特点

近些年养殖业的“公司+农户”关系发生了由市场交易关系向纵向一体化分工关系的转变,实现了产加销一体化、贸工农一条龙。比较明显有肉鸡、蛋鸡、生猪等,这里也有两种模式,一是自建养殖场,如牧原、中粮,通过雇用劳动,使农民成为产业工人,如牧原雇用了10多万农民养猪;二是与农户合作,农户负责生产,公司负责销售。这方面比较著名的公司有温氏集团、新希望等,其典型模式是:公司帮助农户投资建立饲养圈棚,提供种苗、自动化饲养技术、饲料等,农户提供一定的资金、场地和劳动,到期向公司交付产品,公司与农户之间签订固定销售合同或协议,农户只与公司产生关系,不与市场发生关系,不承担价格变动或市场风险,只承担生产产品的风险,市场风险由公司承担。在这种关系中,农户收入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劳动收入,这部分收入由其生产的产量和质量决定,相当于计件工资。二是地租和利息收入,农户利用自己的资金、土地或房屋建造大棚或饲养场,相当于公司将生产场地或生产车间转移到农户家里,公司节省了租地费用,农户增加了资产收入。通过这两种模式,这些产业的现代化水平和规模化水平以及农户收入水平都得到了大幅提高,农户和公司实现了双赢。“公司+农户”关系变化主要有以下特点:

1. 从市场风险看,在“公司+农户”的市场交易关系中,农户承担了主要风险。农户不仅承担了生产风险还承担了交易风险和市场风险,更由于市场地位不平等,使得农户利益经常得不到保护,在公司与农户的纵向一体化关系中,公司与农户交易费用低,农户不承担市场风险,只承担生产风险,而且随着科技进步,生产风险也日趋减少。公司不承担生产风险,只承担市场风险。

2. 从利益关系看,在公司与农户的市场交易关系中,二者基本是零和博弈。农户与公司利益关系不紧密,甚至是利益冲突关系,农户收入低且不稳定。而在公司与农户一体化关系中,二者关系紧密,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农户收入高,且稳定可持续。公司利益与农户深度绑定,公司承担市场风险,公司收入不稳定。

3. 数字技术助推了公司与农户由市场交易关系转向纵向一体化关系。纵向一体化的“公司+农户”之所以成功和迅速发展,与近些年迅速发展的科技进步,尤其是数字技术等密切相关。数字技术使得公司与农户之间的交易费用、监督管理费用、技术培训费用等大幅下降,使公司低成本地实现了对农户标准化投资和对一体化模式的不断复制和扩张。

(三)数字技术与“公司+农户”关系的纵向一体化

网络与数字技术带来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并使现有市场秩序、秩序背后的逻辑以及逻辑背后的价值判断都面临根本性挑战。在一些农业领域,通过数字化改造,使自动化技术取代劳动力,智能技术取代监督。如机器人挤奶对人工挤奶的代替,自动喂养技术对人工喂养的取代,无人机喷洒农药对人工的代替,数字技术的实时监督和提醒等,都使得监督和计量不再成为问题。以蛋鸡和肉鸡养殖业为例,一个农户只需要1个人就能养殖10万只鸡,农户所需要做的就是看着仪器仪表,监控鸡棚的温度变化。这一养殖模式有以下

特点:第一,数字化技术可以轻松解决计量和计算问题。第二,农户收入不是按市场价格而是以最终产量计算,类似计件工资,农户收入稳定易计算,这使农户有充分积极性,不需要额外监督激励。第三,高度自动化和标准化节约了劳动力,降低了劳动强度,如养鸡设施、饲料、兽药、技术、粪污处理都由公司按标准化流程提供,这使劳动力从传统繁重且耗时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因而没有了偷懒的动机。第四,鸡棚的仪器仪表与公司网络联通,农户手机与公司有软件联通,公司也会实时对鸡棚实行监控,一旦发现问题会及时告知农户及时处理。以上四方面的原因使得公司内部监督和激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数字技术使得公司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激励和监督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市场上交易费用也得到有效下降,如淘宝和拼多多平台公司等极大地促进了买卖双方的信息交流,通过大数据、互联网,所有交易成本都大幅度下降。

本文认为,数字技术虽然降低了交易成本,带动了新要素贡献的提升,扩展了生产可能性边界,也能解构一部分组织,如合作社大部分功能完全可以被淘宝、拼多多等平台企业所取代,因为合作社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信息,降低购买价格,寻找市场等,这些功能在平台公司完全可以实现,但数字技术还不能完全解构企业,实现以市场来完全取代企业。最主要的原因是企业不仅仅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存在,更是为了创新而存在:一是创新新产品,即创造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新产品。二是创新新技术,即创造一种更有效率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率。三是发现新市场,即开拓扩大市场的边界。四是开发新产业。如农村现在出现的各种新业态。五是创造新生产方式,比如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改造等。六是创造新组织形式。如淘宝、拼多多等新平台型公司形式。因此,数字技术可以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以及交易方式,但不会改变公司

的性质。公司会永远是市场的经营主体和创新主体。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公司+农户”联结方式可能还会进一步改进和创新,因为数字技术会使农户的土地、劳动力、房屋等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细分。小农户作为一个家庭经营单位可能不再持续,但家庭生产要素会越来越多地进入产业链中的各种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中去,从而得到更高效率的利用和回报。除了劳动收入外,各种财产性收入也会大幅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小农户有三种方式进入分工,一是以劳动进入分工,成为农业工人,二是以土地进入分工,或出租,或入股,三是以房屋进入分工,或出租,或入股,例如农村旅游公司。这样在公司的带动下,小农户可以同步实现现代化,也同步实现共同富裕。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目前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依赖政府提供大量的各种补贴和投入。中国农业现代化不能依靠依赖补贴才能生存的小农户和合作社,而应依靠不需要政府补贴还能为政府提供税收、为社会提供就业、为经济提供财富的各种农业公司。因此,农业公司化是新发展阶段下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必然选择。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1. 破除对农业合作社的教条主义观念。合作社在欧洲的发展与基督教会发展密切相关,农业合作社多起源于教士去农村组织农民进行合作以反抗工商资本或达成其他社会目标,这些教士或知识分子承担了合作社的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中国不具备这种土壤,绝大多数合作社都是大户也就是企业家领办的合作社,合作社只是壳,实质是股份合作公司。在合作社已基本上是股权合作和公司化的今天,应改变合作社只能是经典意义上劳动合作社的观念,更应停止对合作社进行经典合作社

规范化的冲动,允许合作社因地制宜多样化发展。另外,应取消对合作社的特殊优惠政策,使之与农业公司进行平等竞争。

2. 破除对小农户的民粹主义思想。不能以保护小农户作为农业现代化政策的出发点,更不能静态地看待公司与农户的关系。应该看到,市场是连续不断的动态调整、纠错、创新过程,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已经引起公司与农户关系的改变和利益联结机制的调整。现代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小农户作为生产者,工商资本希望其能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作为消费者,工商资本希望其有足够的购买力。公司与农户之间关系也是如此,随着市场调整和纠错,公司与农户日益成为利益共同体,农户既是其产品的消费者,也是其产品的生产者,共同为满足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供给各种优质农产品及加工品。

3. 破除对市场的简单化理解。一般对市场的理解有两个简单化倾向:一是简单地理解为地理含义的市场,即划一块地进行交易的场所,如传统的农贸市场,二是把市场简单理解为亚当·斯密意义上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自行发挥作用,政府不应干预。实际上,市场不是天生存在的,是需要大量投资去发现和开拓的。一方面,这一市场拓展过程中有大量风险,只有企业家才有积极性去投资和发现市场机会并承担风险,这是小农户和小农合作社无法想象和承受的。另一方面,市场离不开政府的作用,还需要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交易公平等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

(二)从战略上明确农业公司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最重要的主体

应明确农业公司(包括已是公司化的合作社)是各种新型农业主体中最重要的主体,是联结其他主体和小农户的唯一载体,是带动小农户进入农业现代化的主导力量,是乡村产业振兴和实现“十四五”规划农业农村发展目标和到2035年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体。要改革

不利于农业公司化和工商资本下乡的各种体制障碍,建立促进农业公司发展的政策体系。

1. 改革户籍制度,建立企业家人才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发展比较好的农村、乡镇企业或者社区合作社,都是由一个能人、大户或企业家带动。当地农民的命运也与这些能人(书记、劳模、人大代表等)息息相关,但由于农村社区封闭,没有企业家市场,使得这些社区企业(合作社、村庄)的命运只能与这个特定的企业家命运绑在一起,其发展往往没有可持续性,兴衰只在几年间。改革户籍制度,实行村庄开放,使企业家人才自由进出农村,享受居住地投资权利,就会吸引外部的企业家人才进入村庄,实现村庄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 推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公司化改革。农村集体所有制来自计划经济,城乡二元体制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统一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要义是相悖的,应推广浙江集体所有制进行公司化经营的经验,通过股份化改造,实现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更有效率的配置。

3. 在税收、补贴、信贷等方面公平对待农业公司。使农业公司在市场上与合作社或其他主体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

(三)建设数字中国,推进农村产业数字化

促进数字技术与农村各项产业深度融合,赋能农业产业链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公司+农户”由市场交易关系转型为纵向一体化分工合作关系,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系机制,带动小农户一起推动农业现代化加速发展,同步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和共同富裕。

(摘自《中国农村经济》2022年第8期
张雅丽/摘编校)

作者简介:李静,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胡焕庸线”——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

秦大河

胡焕庸是著名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他以提出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胡焕庸线”而为世人所熟知和铭记。2009年，中国地理学会发起“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评选，“胡焕庸线”名列其中，被称为20世纪中国地理最重要发现之一，其影响已经超出了人文地理甚至地理学的范围，成为广为人知的中国国情分界线。“胡焕庸线”的提出奠定了中国人口地理研究的基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全面发掘、继承与创新胡焕庸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

1935年，胡焕庸在《地理学报》发表了“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首次揭示了我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当时，官方统计中国总人口约4.59亿，胡焕庸以1个点表示2万人，将2万多个代表人口规模的点逐一亲手标在地图上，再计算等值连线，创制出第一张中国人口密度图，进而提出了一条可以标识中国东西部人口差异的分界线。该线是中国地理学家第一次通过手动运用“大数据”作出的重大发现，被称为“胡焕庸线”。

“胡焕庸线”，即“瑗瑗—腾冲线”，因地名变迁也被称为“黑河—腾冲线”。这条线北起黑龙江瑗瑗（今黑河市），南至云南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直线，将中国人文自然地理版图一分为二。根据胡焕庸当时的计算，线以东的

中国东半部面积约占全国的36%，而人口却占全国的96%；线以西的中国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64%，而人口仅占全国的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台湾重归中国版图及外蒙古（今蒙古国）独立，“胡焕庸线”东侧陆地面积占我国面积的比重升至43.18%，西侧相应降至56.82%。尽管国土面积发生较大变化，但两侧人口分布相对稳定。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东侧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93.68%，西侧人口占比为6.32%，与新中国成立后历次统计结果基本吻合，表明“胡焕庸线”是一条中国人口分布的稳定界线。

“胡焕庸线”也是中国一条重要的自然生态分界线。在地形结构上，线以东大部分地区属于我国地势相对平坦的第三级阶梯和第二级阶梯的东南部分，以丘陵和平原为主。线以西为地势较高的第一级阶梯和第二级阶梯的西北部分，多高山、高原。在气候上，线以东绝大部分属于亚热带和温带季风气候，少部分属于热带季风气候，线以西大部分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和高山高原气候。“胡焕庸线”与我国400mm年平均等降水量线较为贴近，线以东降水充沛，线以西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正是由于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它也是一条重要的农业地理分界线，基本位于我国农牧交错带上，东南部以耕作业为主，西北部以畜牧业生产为主。

从近现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看，“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差异悬殊。东侧各省

区市,绝大多数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侧各省区市,绝大多数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国最主要的7大城市群,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全部位于该线东侧,全国经济排名前50的城市没有一个位于该线西侧,因而“胡焕庸线”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分割线。

自诞生至今87年来,尽管历经疆域变迁和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性变革,发生过建设兵团垦荒戍边、支援大西北、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等人口规模性自东向西的迁移事件,但是这条综合分界线依然十分稳定。其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不仅未被打破,而且早已超越人口地理的范畴,被广泛应用于人地关系所能触及的诸多领域,至今仍在经济、安全、国土优化等国情研究和战略制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胡焕庸线”所呈现的人口分布规律是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地形和气候被视为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我国西北半壁多是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原或年平均降水量在400mm以下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而东南半壁除云贵高原等地外,多为低山、丘陵和平原,降雨丰富。地形和气候的差异直接影响人类生活环境和生产能力,进而制约人类活动与文明的空间拓展。有学者认为,“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特点并非从古至今一直存在,而是在13世纪左右发生气候突变的影响下,随着气温降低和降水减少而形成的。气候突变导致两侧的农业生产潜力发生变化,使得东西部表现出显著的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环境差异。除了地形、气候的影响,社会历史条件在客观上也对中国东西部人口分布产生一定影响。但总的来看,气候、降水等自然因素仍然是“胡焕庸线”形成的基础因素。

“胡焕庸线”不仅是一条人口地理分界线,

也是中国地理环境空间分异的直观写照。中国自然、经济和人口等资源分布不均衡,是从古至今的铁律,也使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成为当代中国国情的突出现象,“胡焕庸线”则深刻反映了这种不均衡的基本国情,成为准确认识中国东西差异和理解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把钥匙。由于其两侧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差异,特别是西侧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和东侧人口过于密集的强烈落差,使得突破“胡焕庸线”的相关议题长期受到关注。

围绕“胡焕庸线”能否突破,社会各界展开了争鸣。学术界大多认为“胡焕庸线”将长期存在,这是因为“胡焕庸线”首先是地理环境塑造的产物。“胡焕庸线”西北半壁几乎囊括了整个干旱及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降水极为稀缺,环境相对恶劣,不适宜人类居住和发展。这种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奠定了我国人口分布的基础,制约着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胡焕庸线”的稳定性。换言之,如果没有重大的气候变化改善西北半壁降水等资源禀赋基础,“胡焕庸线”恐难突破。即使气候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地形、地貌的束缚也仍将长期存在。此外,中国的交通、产业、基建等社会布局短期内难以出现大变动,人口的自然增长与迁移仍将维持一贯的态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会进一步强化“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因此,仅从人口迁移角度突破“胡焕庸线”并非可行之举。

尽管“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或将长期存在,但其背后所凸显的中国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却是当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突破“胡焕庸线”并非要以“人定胜天”的决心肆意改造自然或盲目迁移人口,而是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维护生态平衡、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区域协调发展等战略举措,缩小东西部相对差异,使西部地区基本公

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最终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东部与西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比从2012年的1.87下降至2021年的1.68,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2013年的1.7下降至2021年的1.63,东西相对差异持续缩小,西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生活环境显著改善。但不可否认,东西部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

当前,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我国经济正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转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破解“胡焕庸线”所凸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不仅是改善民生环境、缩小东西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举措,也是当前乃至今后中国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从容应对外部压力的战略支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2020年5月,中央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出发,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优化发展格局为切入点,以要素和设施建设为支撑,以制度机制为保障,统筹谋划、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

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可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破解“胡焕庸线”难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本质是实现东西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不是追求东西部地区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平均发展。加快西部地区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推动西部地区形成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路径上可以紧紧围绕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西部地区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有效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借助外部支持共谋高质量发展。

一是以科技创新引领西部跨越式发展。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引领,科技创新是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和新机制的关键。进一步缩小东西差距、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胡焕庸线”难题,需要不断推进西部地区科学技术的发展。重点是结合西部地区资源禀赋条件、区位优势及发展需求,采取因地制宜的创新发展路径。

二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进西部生态文明建设。西部地区是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西部环境既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大自然的选择。只有遵循西部的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为此,在西部地区现代化进程中,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创新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经济—文化协同建设、人—地协调平衡的绿色发展格局,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

三是通过扩大开放加快西部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西部地区是面向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的前沿,在内陆开放上具有良好、独特的基础条件。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显著提升西部资源配置能力,增强西部产业集聚能力和劳动力吸引力。实施措施上,首先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国际运输和国际交流便利化。其次要构建多层次的开放平台,加快制度创新,提高西部面向毗邻国家的次区域合作支撑能力。最后要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支撑对外开放和区际互动合作。

四是借助东西部协作共谋高质量发展。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促进东西部协作

的重点是促进区域之间的产业合作、资源互补、劳务对接、人才交流等。同时要加快特殊类型地区与东部的衔接,特别是以脱贫地区为重点的西部欠发达地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 and 资源型地区等,通过“一对一”等形式的结对协作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摘自《光明日报》2022年12月28日(11版) 张雅丽/摘编校)

作者简介:秦大河,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上接第22页)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新时代新征程对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反腐败斗争只能加强、不能放松。必须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以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党是推动社会革命最可靠的主心骨,确保党肌体永葆健康、充满活力是推动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不仅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且严重干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唯有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坚定执着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才能为推进社会革命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要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腐败现象不仅恶化党内政治生态,也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为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必须坚持强力反腐。要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

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要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还要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伟大社会革命锻造和成就伟大的党,伟大自我革命保障和推动伟大的事业。新时代新征程上,只要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毫不动摇把党的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就一定能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摘自《经济日报》2022年12月1日 张雅丽/摘编校)

作者简介:王公龙,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普惠金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动力机制与行动路径

——基于日本经验的启示

程惠霞 胡海峰 曾玉藤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我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其中的重要构成。乡村振兴是奠定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重要手段,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由之路,其关键在于“三农”的现代化升级。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等提出的政策目标来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旨在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需要财政、金融、技术与人才等资源的全力投入。学界普遍认为,普惠金融具有疏通落后地区金融供给“毛细血管”、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等功能,将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2005年以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着力提升金融可得性和降低信贷门槛。前者包括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空间扩散、金融机构增设普惠金融服务站、数字普惠金融渠道普及,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由此得到极大缓解;后者是通过征信创新降低贷款门槛、创新产业贷对“三农”倾斜金融资源,推动改善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与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普惠金融因此积累了一些推进乡村振兴的经验并提升了相关能力,有观点主张延续既往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和实践路径,在强

化农村金融渗透性、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增加资金供给量和加强普惠金融业务创新等方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思路的焦点是金融可得性和金融资源投入,是普惠金融传统融资赋权路径的继续拓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规定,乡村是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生活场所,承载着经济发展、社会保障、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等功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个富含经济学、社会学与生态学意蕴,多目标交叉融合的政策体系,对普惠金融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继续撬动和引导更多资金、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流入乡村,还要推进要素与产业、文化、生态、人才和治理相结合;关键是要找到普惠金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和行动路径。

普惠金融动力机制是一个古老又常新的双重底线(double-bottom-line)问题。该问题源自小额信贷运动,强调只有融合财务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小额信贷项目才能吸引商业资本永续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但是两个目标之间天然存在张力,一旦金融监管缺失或失灵,小额信贷机构(MFIs)会更偏爱富裕客户,对贫困客户收费更高甚至诱使低收入者过度借债。这种将穷人当成赚钱工具而不是服务对象的使命偏离(mission drift)现象最终导致

小额信贷危机。

普惠金融建立在小额信贷实践教训基础上,被视为既包含一系列产品及供给方也包括客户群体、服务渠道、政府机构和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的“综合性政策目标”,它不止追求财务目标,更被赋予了一系列社会责任。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要么直接设立政策性普惠金融机构,要么采取费用补贴、财政贴息、税收减免、放松管制等措施来敦促商业金融机构开展支农支小普惠金融业务,破解农村贷款“精英俘获”现象,保障农贷资金公平惠及农户。在公共服务动机理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Theory)框架中,这是应用政策红利促进自动动机与利他主义相容的尝试,是一种激发金融机构超越自私和组织利益、关注更大规模政治共同体利益、支持某些公共项目的诱使机制。由此推导,金融机构股东和高管层获得高度成就感、自我价值实现感、行业声望或社会名誉等“内部报酬”以及财务收益、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等“外部报酬”,是其遵循政策或规制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动力。这意味着,金融机构股东和高管层必然会对政策红利做精密测算,仔细权衡财务目标和社会目标。从普惠金融实践结果看,优惠措施提升了农村金融可得性水平,但未能避免农村贷款“精英俘获”现象,说明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动机与实际行动之间的良性循环尚未形成,普惠金融双重底线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综上,要发挥普惠金融效能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就必须排除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动机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各种阻碍,化解其财务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的张力,将政策遵循由外部调节转化为内部驱动。日本对此积累了一些先行经验。本文通过对日本普惠金融振兴乡村的经验分析,阐释我国普惠金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与行动路径,以期普惠金融的乡村实践提供一定指导,从而完善中国特色的普惠金融理论。

二、日本普惠金融振兴乡村的经验与启示

二战后重工轻农的产业政策、零碎的自耕农体系与缺乏竞争力的农产品等因素导致日本农业农村毫无投资吸引力;发展资金严重匮乏,教育、医疗、卫生、道路、通信与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破败不堪,人居与生态环境因工业化污染而极度恶劣;大量农业人口涌入第二、第三产业,村庄日渐空心凋敝,有些甚至陷入“成片的贫困”状态。1961年日本政府颁布《农业基本法》,开始实施振兴乡村战略,并专门组建了一个由信贷、担保和保险构成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以农林公库、农林中央金库、信农联、基层农协等政策性与合作性金融为主体。结果证明,日本农村普惠金融体系通过采取积极行动达成了政策使命。

(一)日本普惠金融振兴乡村的行动措施

1. 提升基础金融服务可获得性

日本普惠金融体系致力于为农业发展提供全覆盖的金融服务,特别是为农户提供公平的金融服务机会。其中,基层农协面向自耕农、林业渔业经营主体与农林渔合作经济组织,直接提供账户、存款、贷款和保险等基础金融服务。另外还有584家农业协同组合受信农联和农林中央金库指导监督,专注于涉农贷款投放。

2. 提供优惠贷款以解决资金匮乏难题

依托《农业近代化资金助成法》《改善农林渔业经营结构融资制度》《认定农业者制度》等,日本普惠金融机构通过提供专项贷款鼓励农地开垦、土地改良、家畜饲养、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业机械设备与食品保鲜流通投资,贷款额度、期限因贷款用途与贷款对象不同而有所不同;实施差别化优惠利率,如改善农业经营环境是0%~0.3%,改建林业基础设施是0.2%~0.45%,林副产品加工是0.2%~0.5%,新建农林渔业基础设施是0.3%或0.45%,食品流通改善是0.2%~0.35%。贷款支持重点以2010年《第六次工业化法案》

(Act for a Sixth Industrialization)为界,前期支持农业机械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后期逐渐偏重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等附加值提升领域。优惠贷款总量逐年增长,如六次产业贷款总额到2020年底达到了1652亿日元。

3. 创新贷款产品精准对接乡村实际需求

农林公库等金融机构根据农户实际需求开发产品。20世纪60—70年代,为了扶持自耕农扩大生产规模、发展蔬果与畜牧业,农林公库与农协先后推出“综合设施资金”“未垦地取得资金”“畜产经营扩大资金”“果树植栽资金”“果蔬经营改善资金”“修建房舍与仓库资金”“农机具购置资金”“小规模土地改良”“水产动物养殖设施改造重建”等金融产品;为了建设保养村落排水设施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含村落下水道),专门为“认定农户”提供“废弃物处理设施建设”“农村医疗设施”“农村给排水设施改良重建”专项贷款;对经过认证的18~45岁新农民,或未满65岁的知识技能型农民,提供5年经营期的农业专项免息贷款以及生产种植技能培训免息贷款;2014年又新增了“青年就农贷款”项目,资助额度逐年增长。

4. 以高水平配套服务赋能“三农”

日本普惠金融体系并不止步于贷款投放,还以高水平配套服务赋能“三农”,如依托“一村一品”运动打造特色产品产业链、提高初级农产品附加值;依托《农山渔村宿型休闲活动促进法》研发观光农业园、生态体验馆等项目融资方案,支持农民挖掘本地文化与山水资源以发展创意农村、观光农园、生态体验、农业公园等绿色观光产业;依托交通省“多功能型复合道路休息站点”项目资助各类创业者竞标修建“门户型”驿站或“中心型”驿站,支持开展旅游咨询、农产品采购、停车住宿、医疗养老、能源储备等乡村旅游增值服务。此外,日本各类金融机构积极介入农业管理顾问项目,帮助农民了解税收、人力和市场营销情况;促使农民参与农业食品博览会,提高农民和买家之间

的供求匹配度;代表农民参加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举办的出口业务会议,以匹配海外买家的形式开展农产品出口融资援助项目;帮助解决农民面临的管理、销售渠道、财务改善和生产效率问题,激发农民内生动力。

(二) 日本普惠金融振兴乡村的驱动力

日本普惠金融振兴乡村的行动措施取得了良好成效。数据表明:日本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于1972年缩小到0.97,此后一直维持在0.86~0.97之间;青年人就农意愿上升,截至2017年底,日本49岁以下新农民共有20760人,新增人数连续4年突破2万人;乡村90%的污水到2015年就已经通过净化槽处理,生活垃圾100%实现分类与回收,农村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治理,乡村成为城市居民休闲之地。追根溯源,日本普惠金融之所以能够积极采取各类行动振兴乡村,是因为其背后有政策供给、风险化解与政策红利共同汇聚的驱动力。

1. 有效的政策供给

日本振兴乡村战略以促进农村产业发展为着眼点,并根据不同时期的政策重点制定或修订法律政策。金融机构在持续有效的政策信号引导下,向农业农村重点领域倾斜信贷资源。第一阶段(1960—1975年)针对农民增收目标,普惠金融体系重点支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合并村镇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第二阶段(1976—1995年)为了促进城乡融合,普惠金融着力推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和城乡交流,孵化出农家乐等新型农业业态;第三阶段(1996年至今)为了增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村地区活力,普惠金融行动策略调整为撬动城乡要素联动发展一、二、三产业,助力绿色有机农业和环保生态建设,确保粮食安全。

2. 政府主导的涉农贷款风险化解机制

金融本质上是以简单、直接、有效的方式促进投资、创新、增长与繁荣,但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因素导致交易成本高昂;普惠金融

同样如此。为了化解涉农贷款风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日本政府、农业信用基金协会和农林中央金库共同出资成立农林渔业信用基金,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债务担保、保证保险和融资保险,引导基层农协等机构克服“惜贷”心理、降低涉农贷款门槛。另外,日本政府延续以往农业共济组合、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和政府所组成的“多级分担+政府兜底”的风险分散模式,不仅为农作物、家畜、水果(果树)、经济作物、园艺设施等提供保费补贴,还增加农村收入保险,以降低或弥补因农产品价格波动、自然灾害和其他风险给农户造成的收入损失。数据显示,日本注册收入保险制度的农业管理实体数量到2020年底增加了1.3万个,达到36142个。

3. 丰厚的政策红利

日本政府不仅提供低成本财政资金渠道,还广泛实施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建设经费分担等优惠措施以解决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双重底线问题,用丰厚的政策红利化解 MFIs 财务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的张力。如“山区发展支持计划”为雇佣农户挖掘本地特色农产品的中小企业提供力度不等的税后优惠;为村落下水道、排水设施建设提供1/2或1/3的国库补贴;为农户改造净化槽提供40%的补助,如果推动了当地水资源保护,则由国家和地方承担90%的费用。在人才振兴方面,日本政府对有意愿务农群体、参与农业技术培训与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提供生产生活补贴,以此鼓励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贷款和其他配套服务。

(三) 日本普惠金融振兴乡村的经验和启示

日本振兴乡村战略的宗旨是通过制定和实施重大战略、调节重要结构关系和生产布局,实现经济发展。日本振兴乡村的普惠金融行动是其基本国情、生产力水平、国家战略、制度供给与金融机构经营策略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追根溯源,低成本资金来源、有

效的政策供给、丰厚的政策红利和完善的涉农贷款风险化解机制构成的动力机制,敦促金融机构超越组织利益关注国家战略层面的乡村振兴,将经营策略与乡村驿站、农协组织、都市农业等振兴乡村“策略包”有机融合,引导要素至乡村或偏远山区。例如,日本农林中央金库始终根据环境变化灵活调整业务,推动农林渔业向增长型产业转变,自身也实现了较高净收益,有效化解了普惠金融机构财务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的张力。

乡村移民的事例表明,城市与乡村作为人类聚居与生产的两种模式,存在资源、人口、空间、技术、产业与服务等方面的强互动关系。因此,解决乡村问题的出路不在城乡二元结构而在城乡融合发展,普惠金融振兴乡村同样如此,其动力机制核心是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平等交换,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资源要素配置方式,实现城乡产业的深度关联与耦合,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这是日本普惠金融振兴乡村的先行经验,对我国普惠金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目标的达成具有深刻的启示。

三、我国普惠金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与行动路径

《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的通知》《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2021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等政策与配套措施是我国普惠金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最大动力。但现阶段我国城乡经济循环阻滞与农村金融结构不佳等因素导致动力机制运行不畅。为了充分发挥普惠金融功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国必须畅通普惠金融动力机制,并将普惠金融打造为乡村振兴赋能平台。

(一) 畅通普惠金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

近年来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取得长足发展,

县域城郊、偏远农村的个人正规银行账户普及率高达 97.08%，数字普惠金融渠道扩大了农产品销售规模，涉农贷款余额持续增长。截至 2021 年 6 月末，全国涉农贷款余额达 41.66 万亿元。其中，农业银行的全国“三农”与县域贷款余额为 5.9 万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金融扶贫实践积累了一些促进农民增收、产业转型升级和乡村治理的普惠金融行动经验，并推动要素从单向流出乡村格局向城乡双向流动格局逐步转变。但现阶段我国普惠金融资金配置存在忽视粮食生产和小农户需求的倾向，城乡要素流动渠道不畅、城乡市场基础制度与功能不健全、县域经济承载能力较弱、城乡供需结构性错配等城乡经济循环的堵点和断点进一步妨碍了普惠金融动力机制的运行。

1. 通过制度变革疏通、连接城乡经济循环的堵点、断点

数据显示，财产性收入偏低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农民财产性收入偏低与农村土地要素价格机制不健全、城乡土地增值收益分享机制不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迟缓、适合农村地区的金融创新不足、为农民服务的专业理财人员短缺等因素都有关联。在涉农金融服务利润低、风险高等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社会资本与工商资本对下乡投资顾虑重重；金融机构趋利动机与“挑奶皮”心理可能导致其资金配置偏离政策目标，无法撬动资金、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向乡村汇聚。

金融扶贫实践揭示，相对于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林科技人才开发，农产品价格机制、农村土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能更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农村自我循环发展能力。在新一轮科学技术兴起之际，地方政府有责任通过疏通堵点、连接断点以增进动力的制度性变革与更具针对性的政策供给，改善农村营商环境、增强农业投资吸引力、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渠道，鼓励普惠金融业务创新并引导资源要素

流向乡村，改造农业供应链与价值链，推动农业向数字化、智能化与网络化发展，形成有机链接的农业产业价值网络。

第一，以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为核心，深化农村制度变革，为普惠金融创新注入新动能。无论是农村土地与集体资产权益处置，还是农村宅基地与农户承包地有偿退出，均应着眼于将以往不能流动的“农村土地相关权益”释放出来，打破普惠金融创新桎梏，使其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融资安排与配套服务，联动城乡人口、土地、资本、技术与数据要素，推进农村资源就地转化为资产或资本。

第二，完善农业风险分担机制、央行再贷款机制和政策性批发贷款机制，消除普惠金融服务乡村的后顾之忧。在微观层面上以强化普惠金融机构涉农主体股东决策权的方式，增强其服务乡村振兴的意识，支持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技术与服务机构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资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机械设备、农业生产耕作技术、新品种培育、粮食安全、本地特色农林渔副产品挖掘与品牌孵化、生活污水处理、垃圾分类回收等，同时支持和引导小型农户精细化耕作、提高科技含量，从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匹配度。

2. 优化金融结构以适应乡村振兴需求

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首先需要有一个结构优化、多方协作的金融体系。世界范围内的好的普惠金融具有多样性，一个国家只有努力构建适合本国经济发展阶段、富有适应性的金融体系，才能实现其战略目标。然而，现阶段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结构不平衡，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等银行类金融机构占主导地位，保险、证券、基金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规模过小，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不到 1%；金融业务单一，各类产业贷同质化现象突出，配套服务单一；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亟须资金支持，但农村土地与集体产权制度导致

这类贷款风险居高不下;商业性农业保险发展不足;农村资金外流情况因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一度有明显缓解,但仍没有得到彻底改观。在“双碳”背景下,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广为接受绿色发展理念,但绿色金融资源供求严重失衡,资金缺口呈逐年增大趋势,2019年为8000亿元,2020年新增6180亿元。另据红杉中国测算,2021—2030年该缺口平均约为2.7万亿元;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发展基金和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工具之间的协同性尚未形成,绿色债券发行利率虽维持在较低空间(票面利率在2.08%~4.5%),但商业银行发行动力明显不足。

为了引导金融“活水”持续流向乡村振兴领域,我国必须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优化普惠金融结构。第一,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功能,完善乡村振兴批发贷款、委托贷款、联合贷款、专项债券等信贷资金供应工具,以更精准的优惠政策使金融资源采取组团投资、协同投资和整合重组等方式投向乡村,引导乡村富余资金就地转化;第二,适度放宽金融监管,鼓励村镇银行等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扎根乡村、下沉一线,开展错位竞争,提升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力,从而优化贷款条件、降低贷款门槛、促进民营企业投资,抑制农村资金外流;第三,完善农业保险体系,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范围,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在价格险、天气险、病虫害险等产品基础上,创新农业保险品种和保险定价技术,拓展保险保障范围、降低保险费率,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与主动性;第四,激活农业资本市场,开展乡村振兴股权众筹试点,帮助农村优质企业或品牌筹集资金,改善其融资结构与财务结构,促进资本与产业良性循环;第五,加强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以《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2021年)》为推手,改善农村投资与营商环境,吸引资金回流农村,提升粮棉油等重

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水平,支持农林渔业副业生产、加工、运输与销售。

(二)普惠金融成为乡村振兴赋能平台的行动路径

事实上,普惠金融可被视为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一项公共物品。它是乡村每个居民都能从中受益的公共福利,其供给存在稀缺性,离不开政府支持,但其使用者的范围边界很清楚,应遵循使用者付费原则。作为一个促成乡村振兴的混合性政策工具,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目前存在业务单一、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既无法依靠政府管控包办得到解决,也无法依靠金融机构自主合作的集体行动找到出路。此时就应回到起点,通过规则设计与资源投入将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为乡村振兴赋能平台,这是一种更为理性、更加现实的选择。基于乡村振兴赋能平台的思路,普惠金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行动焦点是在提高农村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基础上,以高水平金融服务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与平等交换。

1. 引入金融社工机制,为农户赋能

金融社工能改善个体与金融有关的思维、行为、情感与态度,被广泛应用于协助弱势群体、脆弱家庭与社区扩展普惠金融机会,因而能够促进农民对储蓄、贷款、保险、理财、投资等金融工具的认识、理解与选择,进而达到积累资产、投资教育、应对意外和突发情况等现实目标。金融社工凭借资源链接者、教育者、管理者等角色,通过宣传、手把手教学、场景训练等方式,深入农村社区普及金融知识,助力农民树立正确的财富与理财观念,引导农民熟练使用线下渠道、掌上银行或数字金融服务,深度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农民使用账户办理业务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积累金融素养、培育自身效能感的赋能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提升农户能动性、将信贷资金转化为生产性资本能动性的必经之路。

2. 善用、巧用数字金融技术,精准对接乡村振兴需求

在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趋势和智能手机广泛普及的背景下,城乡空间关联效应因云计算、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应用得到强化,生产要素流动和空间配置路径彻底变革,城乡组织与链接更加便捷、精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应当积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彻底改变现有贷款发放模式,将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根据不同地域乡村的资源禀赋、人口结构、产业形态和发展短板来确定经营策略,挖掘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新业务,精准对接乡村振兴需求。比如,提供资金帮助农户孵化特色品牌,打破同质化模式,凸显不同乡村的经济、生态、社会与文化价值,以点带面推动村落群与特色产业;支持农业经营主体提升农产品加工、设计、包装、存储(冷藏)、运输与销售能力,延长产业链、变革价值链、优化供应链;通过掌上银行的电商平台等配套服务,将支付、交易与物流有机连接起来,提高农产品供求对接精准度,降低流通成本,减少鲜活农产品损耗,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扩大交易规模。

3. 融合绿色理念与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曾经支持农民扩大种养殖规模、发展乡村旅游和民宿经济脱贫致富,但也曾引发盲目扩大规模、盲目建设休闲旅游设施、照搬城市建设模式、破坏生态环境等问题。根据《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全面振兴乡村是追求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追求粮食与食品安全、水安全、能源安全、土地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追求天蓝、地绿、水清与人和。这意味着普惠金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行动必须融入绿色金融理念,只有那些将绿色低碳、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理念融入自身发展的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才能获得金融资源。在“双碳”背景下,普惠金融机构超越传统“求稳妥、追利润、降风险”认知,将支持乡村振兴与生态环保联动,依托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政策、生态农业示范项目、低碳

排放项目、农业园区循环改造项目、新能源推广项目、环境权益交易项目等,研发绿色消费、绿色按揭、绿色信用卡、绿色理财产品、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绿色企业上市等工具,引导农户更多采用绿色、有机与安全生产方式,发展生态农业、智慧农业与低碳农业。

4. 联动业务发展促进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人才匮乏会直接影响资金、技术等要素效用的发挥,技术人才短板已经成为乡村振兴有序推进的最大隐忧。金融机构在吸引人才、推动农村产业升级与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其一,金融机构可将金融服务与农业科技人才培养项目联系起来,宣讲财政补贴政策、创业税费优惠政策,加强农户知识技能培训,更新农村存量人才知识体系,提高其金融素养、市场营销能力、管理能力与法律意识;其二,金融机构可将产业贷款项目与地方政府农业创业基金、各类优惠政策结合,以优化贷款审批流程、一定比例低息或免息初创资金或一定比例减少创业失败损失保险等方式,鼓励返乡人才将新产业理念、产业技术与市场理念带回农村,弥合城乡观念鸿沟;其三,金融机构直接向农业技术人才倾斜金融资源,增强农业吸引力,鼓励知识技能型人才留在农村,降低城乡文化割裂效应;其四,金融机构依托客户关系网络发起CSR或ESG项目,短期或长期聘请城镇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农业技能人才下乡担任志愿者、挂职兼职,或投资项目、捐资赠物,或推广农副产品,或提供法律服务、社工服务等,吸引更多人才投身乡村振兴事业。

(摘自《金融与保险》(人大复印资料))

2022年第9期 张雅丽/摘编校)

作者简介:程惠霞,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聚焦学科前沿 服务教学科研

JIAO XUE CAN KAO

教学参考

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699 期)

2023 年 2 月 25 日编印

主 办: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编 印: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

排版印刷: 甘肃金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邮 编: 730071

电 话: (0931) 7768718

邮 箱: gsdxtsgckzx@126.com

印 数: 1~1000 册

地 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北滨河西路 456 号